

## 第二章 認識台灣

### 1910 年代前後官方觀點與民間觀點下的台灣

#### 前言

「台灣」這個地名，首次對日本民眾造成震撼性的印象，可以說是肇始於「牡丹社事件」（1871-1874）<sup>1</sup>。1874 年（明治 7）日本以保護琉球藩民為由，出兵討伐台灣南部的原住民部落。這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首次向國外發動戰爭，該事件可說是日本開始發展帝國主義的徵兆。牡丹社事件發生之後，日本的新聞媒體頻繁報導事件始末，台灣的原住民族被賦予「野蠻」、「食人」等概括的觀念。由於當時的日本人對於台灣事物不甚瞭解，因此報導的內容取向也左右了日本人的台灣認識。在地理文化上，「南方」的「未開化」也成為日本人對南方的刻板印象<sup>2</sup>。因為這個事件，許多日本人把台灣和野蠻的「蕃人」劃上等號，對台灣也充滿獵奇心態。台灣在 1895 年（明治 28）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日本逐步建構台灣的認識論，台灣的形象逐漸從模糊未明到清晰可見。日本在明治中期開始發展「南進論」，在帝國擴張主義的論述上，南方的地理方向，是相當明確的；但是南方的形象，則有待各種文本來形塑。台灣被當作南進政策的起點，台灣的地理與風土，也極可能轉化為日本人想像「南方」的表徵。

明治到大正初期的台灣圖像，主要來自殖民地官吏與人類學者等專家之手。藉由各種專業的官方報告與人種、物種調查，台灣各種事物開始被認識、被建構，逐步形構了日本帝國的南進論與南方學。可以說，殖民地本身就像一座博物館，鉅細靡遺地全面展示在殖民者眼前。本章第一節所探討的南方書寫《台灣統治志》與《南國記》，可以視為這段時期官方觀點的代表論述之一。1904 年（明治 37）來台訪問的史學評論家、政治家竹越與三郎（1865-1950），於翌年出版了宣揚殖民政績的《台灣統治志》。這本書的內容相當豐富，引用資料皆由台灣總督府所提供，以量化的方式呈現日本殖民統治的績效。在 1909 年他展開南方視察旅行，回國後出版《南國記》，並提倡南進論。《南國記》涉及的範疇從台灣擴大到東南

<sup>1</sup> 關於牡丹社事件的探討，可參閱藤井志津枝，《近代中日關係史源起：1871-74 台灣事件》，台北：揚智文化，1992 年 12 月初版；戴寶村，《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台北：自立晚報，1993 年；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台北：博揚文化，2006 年。

<sup>2</sup> 山路勝彥，《台灣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蠻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4 年 1 月第一刷，頁 34-35。

亞區域，不僅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政情有敏銳的觀察，也是一部異國情調的遊記。它被日本學者矢野暢評價為是讓日本大眾階層對「南進論」普及認知的濫觴之作，原因除了作者的知名度之外，還有竹越的文章乃至於文體的魅力。誠然，竹越與三郎的台灣與東南亞之旅為他攜來豐富的南方知識，《台灣統治志》與《南國記》其實也投射了帝國主義的目光。《台灣統治志》的文本性質顯然是為了宣傳殖民論述而寫，《南國記》在文學性之外則明示了作者的南進觀點。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在其帝國主義的發展路線上，透過各種文本逐步建構出一套南進論述，在大正、昭和初期逐步形成一種南進觀的政治無意識，竹越與三郎的作品可以說是這個論述的濫觴之一。

「南方」所涵蓋的定義，原本只單純指涉地理方位的南方，近代日本文學的南方印象，也受到歐洲作家書寫南方文學的影響。不過，隨著明治到昭和時期「南進論」的形塑過程，混沌未明的南方形象透過作者的文字書寫而漸具雛型；一個需要被征服、被開拓、被啟蒙的「南方」儼然浮現。就文學生產而言，日本在領台以後出現許多以台灣為背景的文學作品。透過閱讀市場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顯示出了日本國民對台灣事物的興趣<sup>3</sup>。但是這些作品多是想像之物，內地作家親自踏上殖民地，以台灣體驗所完成的紀行文學，大抵就屬佐藤春夫《霧社》是既為人周知又優秀的散文作品<sup>4</sup>。然而在佐藤春夫之前，已有人發表文學價值頗高的台灣紀行。本章第二節要討論的古村古峽，初登文壇時深受作家夏目漱石的知遇。他在年輕時代對文學創作懷有極大熱忱，後來轉向研究變態心理學，以心理學者聞名。中村古峽在大正初期發表了兩篇台灣相關作品〈到鵝鑾鼻〉與〈來自蕃地〉，以作家的知名度而言似乎無法與佐藤春夫並置相論，但是這兩篇作品不僅有文學性，它們所凸顯的時代與歷史意義更具探討價值。

1913 年來台灣旅行的中村古峽，在該年 6 月的《東京朝日新聞》即發表了〈到鵝鑾鼻〉。在這篇台灣紀行當中，描寫作者從阿猴（屏東）出發來到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沿途所見所聞，展現了饒富趣味的台灣風土民情。而 1916 年（大正 5）刊登在《中央公論》的〈來自蕃地〉，是首篇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在日本綜合性雜誌發表的作品<sup>5</sup>。《中央公論》在該期以「世界大觀號」為主題，選錄九篇以各國的「異國情調」為主的小說創作，其中描寫到台灣南部原住民部

<sup>3</sup> 島田謹二，〈明治の内地文学に現われたる台湾〉（明治的内地文學中所展現的台灣），《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 年，頁 39-64。

<sup>4</sup> 關於日本作家在領台初期到中期以台灣為取材對象的寫生作品，島田謹二在〈台湾に取材せる写生文作家〉（取材於台灣的寫生文作家）有詳細介紹，收入《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 年，頁 39-64。

<sup>5</sup> 河原功，〈日本人の見た台湾原住民——中村古峽と佐藤春夫〉（日本人看到的台灣原住民——中村古峽與佐藤春夫），收入山口守編，《講座 台湾文学》，東京：国書刊行会，2003 年，頁 61-86。

落旅行的〈來自蕃地〉，就是標榜代表「台灣」的作品。這篇紀行文體的小說，描繪主角到 1974 年發生牡丹社事件的原住民部落旅行。中村古峽的足跡深入屏東與台東的山區，〈到鵝鑾鼻〉與〈來自蕃地〉是作者的親身經歷，這兩篇創作不僅早於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也展現了大正時期日本民間的知識人對於台灣風土的親身觀察。在領台之後，日本作家陸續以「牡丹社事件」、「蕃社」、「蕃女」、「霧社事件」為創作材料，這些作品的數量頗豐，不難藉此窺探日人作家對於台灣原住民主題所持有的興趣。

不論是明治末期的政治書寫《台灣統治志》、南進論述《南國記》，或是大正初期的旅行遊記〈到鵝鑾鼻〉、異國情調小說〈來自蕃地〉，都不斷指涉出作者透過書寫「南方」，也參與了帝國的海外擴張。蠻荒南方的殖民地意象，是他們作品中都存在的內涵；他們的台灣書寫展現了盎然趣味與南方情調，對日本讀者有其美學與報導的效果。不過在台灣原住民「未開」(savageness)的描寫部分，也有可能深化日本人自牡丹社事件以來對台灣的刻板印象。竹越與三郎以及中村古峽的作品，就其時代意義來說，可以視為日治初期從發現到建構台灣的認識論。台灣作為帝國慾望的投射，在他們的文本中，如何再現殖民地？而南方思維是以何種書寫方式呈現？從而，中村古峽的民間立場和日本官方的台灣觀點是否具有差異性，將是本章所要詮釋的方向。

## 第二節 官方觀點・認識台灣

###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南國記》的台灣書寫與南進論述

#### 一、引言

近代日本從明治中期以降，開始發展「南進論」。矢野暢在《日本的南洋史觀》提出七人做為明治期「南進論」者的代表，他們分別是志賀重昂、服部徹、田口卯吉、鈴木經勳、菅沼貞風、稻垣滿次郎、竹越與三郎<sup>6</sup>。其中，竹越與三郎（1865-1950）是和台灣最有淵源的一位<sup>7</sup>。矢野暢以 1910 年（明治 43）所出版的《南國記》做為竹越與三郎的「南進論」代表作，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章節，是探討台灣的殖民現狀<sup>8</sup>。不過，竹越與三郎的台灣書寫，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1904 年（明治 37）他接受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邀請來台訪問，1905 年（明治 38）他出版了宣揚殖民政績的《台灣統治志》<sup>9</sup>，內容詳述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十年的發展。作者在自序中提到：「書中所引用的資料，主要是依據台灣總督府的贈與文書」<sup>10</sup>，這些資料伴以大量的調查文獻與統計數據，增加了《台灣統治志》的可信度。後藤新平（1857-1929）為該書所寫的序也讚揚這是一本考據精明、

<sup>6</sup> 矢野暢舉出這七位「南進論」者的代表作，分別是志賀重昂的《南洋時事》（1887，明治 20），服部徹的《日本之南洋》（1888，明治 21）、《南洋策：一名南洋貿易及殖民》（1891，明治 24），田口卯吉的《南洋經略論》（1890，明治 23），鈴木經勳的《南洋探險實記》（1892，明治 25）、《南洋巡航記》（1893，明治 26）、《南洋風物誌》（1893，明治 26），菅沼貞風的《新日本の圖 南の夢》（1888，明治 21），稻垣滿次郎《東方策》（1891，明治 24）、《東方策結論草案》（1892，明治 25），竹越與三郎《南國記》（1910，明治 43）。請參閱《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9 年，頁 16-17。

<sup>7</sup> 竹越與三郎（1865-1950），日本明治到昭和期的史學評論家、政治家。埼玉縣本庄出身的竹越，是清野仙三郎的次子，1883 年（明治 16）成為竹越藤平的養子。慶應義塾大學中退後進入新聞界，先後在《大阪公論》、《時事新報》、《國民新聞》擔任政論記者，在這段期間也因為創作《新日本史》、《二千五百年史》而得到陸奧宗光、西園寺公望的知遇，成為雜誌《世界之日本》的主筆。竹越後來進入政壇，1898 年（明治 31）在伊藤內閣的西園寺文相之下擔任文部省勅任參事官，翌年渡歐到各國視察。1902 年（明治 35）以來當選過五次的眾議院議員，隸屬於立憲政友黨，1940 年（昭和 15）被任命為樞密顧問官。竹越在 1915 年（大正 4）和本野一郎、池田成彬等人發起「日本經濟史編纂會」，在 1919 年（大正 8）刊行了《日本經濟史》八卷，成為確立日本經濟史學的礎石。此外，還有《台灣統治志》、《陶庵公》、《南國記》等著書。關於竹越與三郎的詳細生平，請參閱本章附錄一：「竹越與三郎年譜」。

<sup>8</sup> 竹越與三郎，〈第八 印度支那より台灣〉（第八 從印度支那到台灣），《南國記》，東京：二西社，1910（明治 43）年 4 月，頁 281-350。

<sup>9</sup>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 年（明治 38）。本文參考之復刻本係由台北：南天書局發行，1997 年。

<sup>10</sup>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を題す〉，《台灣統治志》，頁 1。

翔實描寫日本統治台灣實況的專書<sup>11</sup>。兩年後的 1907 年，這本書還出版了英文譯本，向西方介紹日本的殖民統治<sup>12</sup>。英文版本的出現，絕對不是偶然的，應該是日本殖民政府所主導的書寫計畫的一部份。

1910 年（明治 43），竹越又出版了《南國記》，論述的範疇則擴大到東南亞區域。這本書不僅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政情有敏銳的觀察，也是一部帶有異國情調的遊記。日本學者矢野暢在其著作《「南進」的系譜》指出，明治時期的南進論者中，志賀重昂和竹越與三郎這兩位人物是最值得注目的，因為他們的見解有別人無法取代的特點<sup>13</sup>。矢野暢以他們的作品《南洋時事》、《南國記》來談這兩位作家的特質：志賀重昂（1863-1927）在他《南洋時事》中，重新賦予「南洋」以獨特的概念而有別於西洋與東洋。而竹越與三郎以優秀文筆所完成的《南國記》則是讓日本大眾階層對「南進論」普及認知的開山之作<sup>14</sup>。另外，矢野暢也指出，日本其實在江戶時代就有南方經略論，卻是屬於思想史的範疇。日本在成為近代國家後進行的「南進論」，要到明治 20 年代（1887 年以降）才出現。然而，明治中期所展開的「南進論」，是來自在野的、民間的聲音，而且是平和地經濟進出南洋為考量之下的「善意」思想。包括志賀重昂、竹越與三郎等人，都是民間「南進論」的代表。他舉竹越與三郎為例，說明他在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後即投身於新聞工作，和官方並無直接關係<sup>15</sup>。

針對這一點，筆者認為，有關對竹越與三郎的定位與評價，還是要把《台灣統治志》和《南國記》並置討論才能彰顯其意義。在第二章的論述中，我把竹越與三郎視為官方觀點的代表，和矢野暢有不同的看法。從竹越與三郎受邀撰寫《台灣統治志》到《南國記》所展現的帝國觀察視域，他和日本官方的關係應該相當密切，甚至可以說是代表官方立場。矢野暢在《「南進」的系譜》當中的發言，顯然忽視了竹越與三郎後來進入政壇的事實，也沒有釐清文化與帝國主義之間的

<sup>11</sup> 後藤新平，〈序〉，《台灣統治志》，頁 2。後藤新平（1857-1929）是醫生、官僚、政治家。曾擔任台灣民政長官、滿鐵初任總裁、遞信大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東京市（現在的東京都）第七屆市長、東京放送局初任總裁、拓殖大學第三屆總長，也是日本發展帝國主義時期具有才能的殖民地經營者與都市計畫者。在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1898-1906）與滿鐵總裁（1906-1908）的任期中，支持日本的大陸進出政策，任鐵道院總裁時對於國內的鐵道整備具有貢獻。此外，關東大地震後，擔任內務大臣兼帝都復興院總裁，訂下了東京都市復興計畫。

<sup>12</sup> Yosaburo Takekoshi,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7. 本文參考之版本係由台北：南天書局發行，1978 年。將日本版本和英文版本相互對照，可以發現英文版本並非逐章、逐字翻譯，而是有所刪減。

<sup>13</sup> 關於矢野暢對於志賀重昂和竹越與三郎的討論，請參閱《「南進」の系譜》，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7 年 6 月 8 版，頁 55-64。

<sup>14</sup> 志賀重昂（1863-1927）在日本岡崎市出生，1884 年（明治 17）札幌農學校畢業。1887 年（明治 20）《南洋時事》出版，1894 年（明治 27）《日本風景論》出版，1927 年（昭和 2）去世。志賀重昂是日本聞名的地理學者，也是活躍的政治家、政治評論家。他根據自然科學來解明日本山水風景的專書《日本風景論》，以嶄新的眼光重新發現日本之美，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sup>15</sup> 請參閱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7 年 6 月 8 版，頁 65。

關係。不過，矢野暢在 1974 年出版了《日本的南洋史觀》，這本書的主題和《「南進」的系譜》相當類似，討論的範疇也非常接近。在這本書裡，他提到明治時期的七位「南進論」者，竹越與三郎自然也在其中。矢野暢在書中再度肯定了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以及他的文學才能，這些論點他在《「南進」的系譜》已經說過。不過，在《日本的南洋史觀》他不再言及關於竹越與三郎的發言立場問題，反而加重日本帝國主義與南進論之間的關係。這應該可以解讀為：矢野暢或多或少修正了他之前的論點。無論如何，他在「南進論」系譜的發現，其歷史價值是值得肯定的<sup>16</sup>。矢野暢對於志賀重昂、竹越與三郎的評價，自然無法脫離明治到昭和時期的歷史氛圍。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在其帝國主義的發展路線上，透過各種文本逐步建構出一套「南進」的論述（discourse），進而形成一種政治無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志賀重昂和竹越與三郎可以說是這個論述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本文選擇以竹越與三郎為主題，除了他的《南國記》在南進系譜上的重要性之外，也因為他的台灣相關作品《台灣統治志》。

在《台灣統治志》的書寫準備階段，竹越與三郎兩次來台蒐集資料，隨後他又以親身的台灣經驗，應用在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文化、社會、政情的觀察上，而完成了《南國記》。誠然，竹越與三郎的台灣與東南亞之旅，為他帶來了豐富的殖民地想像，《台灣統治志》與《南國記》其實也投射了帝國無限的欲望。《台灣統治志》的文本性質顯然是為了宣傳殖民論述而寫，《南國記》在文學性之外也明示了作者的南方觀點。新聞記者出身的竹越與三郎，也是一位史學家、政治評論家、政治家。在帝國主義與知識運作的共同基礎上，竹越與三郎的政治地位與史學、文化專業，成為相輔相成的力量，而對明治以降的南進論述形成一定的影響。台灣是日本南進政策的起點，所謂的殖民地意象或南進思維，以何種書寫策略出現在竹越與三郎的兩個文本當中，將是本論文所要詮釋的方向。

## 二、《台灣統治志》的殖民地論述

未開の國土を拓化して、文明の德澤を及ぼすは、白人が從來久しく其負擔なりと信じたる所なりき。今や日本國民は絶東の海表に起ちて、白人の大任を分たんと欲す。知らず我國民は果して黄人の負擔を遂ぐる

<sup>16</sup> 矢野暢的童年時期曾經在滿州住過十年，所以稍能理解戰前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生態，也對此議題抱持興趣。後來他從事東南亞研究，在 1964 年還跑到馬來半島的一個回教村進行調查，在那裡和村民生活了兩年，這個經歷對他往後的影響很大。

の幹能ありや否や。臺灣統治の成敗は、此問題を解決するの試金石と云はざるべからず。〈臺灣統治志に題す〉

白種人很久以來就相信：拓殖尚未開化的疆土並為其帶來文明的德澤，是他們所要擔負的責任。現在日本國民正從極東的海洋崛起，希望分擔白種人的大任。不知道我國民果真是否具有完成黃種人的承擔的才幹？臺灣統治的成敗，可說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試金石。〈題臺灣統治志〉

這是竹越與三郎在《臺灣統治志》寫下的第一段話，是這本書的微言大義所在，也點出了日本模仿歐美帝國的企圖，亟欲成為東洋的新霸權。毫無疑問的，西方殖民者相信，如果佔領未開化的土地是他們的任務，則不管被殖民者是否感謝或者理解，一旦這是他們的責任，就有如上帝所賦予的天職，應該去救贖落後的人種。竹越巧妙地挪用了這個概念，而把臺灣統治的問題，成為試煉日本帝國是否具備殖民才幹的試金石。作者以此提問作為本書的開端，其書寫策略除了要向世人證明臺灣統治的成功之外，也在向西方宣示歷經明治維新的日本已具備發展帝國主義的條件。這是因為台灣是日本第一個獲得的殖民地，當時日本國內有出現許多反對接收的聲浪。另一方面，西方也在注意逐漸崛起的日本帝國。臺灣統治的成敗與否，對內對外，日本政府都承受極大的輿論壓力。

《臺灣統治志》的問世，志在以官方說法達到消弭雜音的作用。尤其是1907年（明治40）所出版的外文譯本，直接以英文面貌向西方介紹日本的殖民統治，此書能在頗短的時間內就翻譯完成，極有可能是日本殖民政府所主導的書寫計畫的一部份。《台灣日日新報》在該年的8月，還轉載了國外方面各報章對於此書的評論〈臺灣統治批評〉，文章中除了簡介《臺灣統治志》的內容之外，發言也多站在肯定台灣統治的立場<sup>17</sup>。可見這本書應該為台灣總督府帶來正面的聲譽，也讓世人清楚台灣在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的近代化過程。後藤新平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提到了，世上議論台灣統治得失的很多，但是能夠做到善視篤論的很少，多半只在皮相摸索、無法切中核心<sup>18</sup>。對後藤新平而言，由竹越與三郎來執筆書寫此書，應該是最佳的選擇，以他的專業學養與知名度，是絕對可以勝任的。不過，對台灣不甚了解的竹越，能夠迅速蒐集到資料並且完成書寫工程，其中得力於後藤新平的協助是不言而喻的。

<sup>17</sup> 請參閱〈雜報／臺灣統治批評〉（一）、（三），《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明治40）8月14、16日，此篇文章是轉載歐美各報對於《臺灣統治志》的介紹與評價。另外，9月份還有另一篇文章也是相同性質的報導，請參閱岳洋譯（香港デーリブレス所載），〈雜報／臺灣統治批評〉（上）、（下），《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明治40）9月5、6日。不過此篇文章在肯定日本殖民政策之外，也注意到台灣人民納稅沉重的問題。

<sup>18</sup> 後藤新平，〈序〉，《台灣統治志》，頁1。

1898 年（明治 31）2 月末，兒玉源太郎就任台灣第四任總督，他隨即在 3 月初任命後藤新平成為台灣的民政長官。兒玉是歷任總督中，唯一同時兼任日本國內軍事要職的官員。在他擔任台灣總督的時期（1898-1906，共 8 年），由於軍政事務相當繁忙，因此待在台灣的機會很少。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政策運行，實際上是由後藤新平負責。後藤新平是醫學背景出身的民政長官，也是台灣現代化的重要奠基者。透過《台灣統治志》的各章節，不難發現竹越在這本書裡面研究了台灣過往的歷史、地勢、自然、人種，以及在接受日本殖民之後所進行的土地與人口調查、生番狀態，在經濟開發方面則談到了專賣制度、產業狀況、通商貿易，還有衛生、教育各個人民生活層面的改革，監控人民日常細節的警察機關與司法監獄等等<sup>19</sup>。行文中所展現的思維理路，可以窺探出後藤新平的治台政策。

在第一章〈殖民及殖民國〉，作者即透過生物學的原理來談殖民主義：「生物學的原則到處支配著人類」，在世界的文明發展中，都常伴隨以海洋的力量，強調以「海」做為媒介的移民或殖民方式。所以殖民的歷史，是和海運的歷史相始終的。而在海外據有殖民地的國家，就好像擁有庭園的人家，可以把國民所剩餘的活力往殖民地排泄出去，殖民地如花草一般吸收了這些排泄物卻轉化成更清鮮的空氣回饋給殖民母國<sup>20</sup>。從海洋向外擴張的概念，是竹越與三郎提出南進論的重點，有別於當時另一派人士強調北進論；所謂北進論，是指從大陸方向往露西亞、朝鮮半島、中國北部等前進<sup>21</sup>。在這裡可以看出，竹越與三郎將自己的南進觀點與後藤新平的生物學概念結合，指出台灣統治的合理性與利益性。

在同化政策方面，竹越對於日本憲法是否適用於台灣的問題，抱持反對的態度，這也和後藤新平的理念是相符的。在第三章〈台灣統治法制上之觀察〉，竹越與三郎以為台灣的人種、風俗、歷史、風土等都和日本本土有所差異，日本法律若是直接移植到台灣來施行，一定會因為民情不同而造成紛亂，所以並不適用於殖民地。因此，在總督府提出因應台灣統治的獨立法制之前，還是繼續延用六三法為宜。在 1905 年（明治 38）第 21 屆帝國議會中，竹越極力支持延續六三法<sup>22</sup>。第三章所提到的政治理念，無論是對同化政策的排斥，或是尊重舊慣調查，不僅是後藤新平治台的特色，亦在強調台灣人和日本人的種差異。然而看似體貼殖民地人民的作法，其實也存在著日本人的優越主義。站在生物學的立場，台灣人的種是比日本人落後的，所以施行同化政策是不合宜的。至於舊慣調查，

<sup>19</sup> 請參考附錄一：《臺灣統治志》章節目錄。

<sup>20</sup> 竹越與三郎，〈殖民および殖民國〉，《台灣統治志》，頁 1-2。

<sup>21</sup> 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9 年，頁 50-53。

<sup>22</sup>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の法制上の觀察〉，《台灣統治志》，頁 68-85。所謂「六三法」是 1896 年 3 月 30 日本在台灣施行的特別法律，將台灣殖民地之立法權委交台灣總督，原本施行期間已 3 年為限，但是後來又被一再延長，並於 1906 年改為有效期限五年「三一法」，但是「六三法」與「三一法」在本質並無差異。

則是要鉅細靡遺地瞭解台灣人的生活習慣與風土民情，這和人口調查是相輔相成的殖民手段。

後藤新平認為掌握土地和人口是施政的根本，因此在擔任民政長官時期，推動地籍和戶籍調查不遺餘力。《台灣統治志》第五章所談到的〈台灣的地勢自然、人種〉、第六章的〈土地調查及大租權整理〉、第十四章的〈人口問題及國家營業主義〉都出現了精密的調查數據，另外在談論台灣經濟產業的各章也附加大量的統計資料，充分顯示了後藤新平對於調查與統計的偏好。在他擔任民政長官時期，以總督府技術官僚身份前往台灣各廳、視察國勢調查和統計相關業務，並且負責人口調查工作的水科七三郎（1863-1940）<sup>23</sup>，曾經在紀念性文字〈後藤伯與統計〉中提到後藤新平在統計上的才能：「人們所周知的後藤伯，是醫者、政治家，而且個性豪放、磊落。但是，一方面他極盡緻密、周到，特別是在統計上精通之事，則似乎不太為人所知。」水科七三郎在文章中還舉了二、三件事來說明後藤新平在台灣施行統計事業的政績，其中談到他受命委託編纂《台灣十年間之進步》<sup>24</sup>，以統計表來呈現台灣統治的發展：

後藤伯在民政長官任內，有一天我向他提議將領台以來十年間的進步用統計的方式呈現並公開刊行於世如何呢？長官理解我的想法之後，立刻引領我到樓上的書房，並且指示了書架上分類的各種統計，他說：「我曾經考慮過這件事，也一直在蒐集這方面的資料，但是尚未達到完成的階段，所以趕快著手進行吧。而在台灣財政獨立的計畫書方面因為有許多重要的統計，到峽事務官那裡去閱覽吧。」我接受了這個提示。自此數月之後，我編纂了和英對譯的《台灣十年間之進步》（The Progress of Taiwan (Formosa) for Ten Years 1895-1904），在明治 39 年 2 月出版並廣泛分發中外各地。雖然當時在內地好像沒有很大迴響，可是在歐美的新聞雜誌當中，也有將之摘錄或評論讚嘆台灣之進步的文章。而外國人對於統計的一目瞭然，亦表敬佩。<sup>25</sup>

這一段憶往，不僅生動地描繪出後藤新平對於統計事業的熱衷，也可看出他在台灣統治的用心。而這些努力調查的過程，最後透過數據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對不熟悉台灣的西方人來說，經濟的成長、產業的提升、教育人口的增加，

<sup>23</sup> 水科七三郎（1863-1940）生平不詳，1903 年 12 月，以總督府技術官僚身份前往台灣各廳，視察國勢調查和統計相關業務。

<sup>24</sup> 台灣總督官房文書課編，《台灣十年間之進步》，1906 年（明治 39）。

<sup>25</sup> 水科七三郎，〈後藤伯と統計〉，《吾等の知る後藤新平伯》，東京：東洋協會，1929 年（昭和 4）7 月發行，頁 314-318。本書為後藤新平逝世後的紀念文集。另外，文中所提到的「峽事務官」，應該是指當時任職總督府主計課的事務官峽謙齊，請參閱《台灣總督府職員錄》。

都可以透過數字來描繪一個島嶼。數字的變化是一目瞭然的，也是最不需要思考的。而數字所代表的理性，也轉化成台灣統治的近代性。然而對居住在台灣的人而言，隱藏在數字背後的真相，可能是各項專賣制對台灣人民的剝削、日方資本家與勞農之間的薪資糾紛，或是選擇性的教育政策，這都被統計數字與圖表排列掩蓋了。這是一項高明的宣傳策略，《台灣統治志》和《台灣十年間之進步》的出版，挾帶著強勢的理性思維，以大量數據向西方展現亮麗成績，學醫出身卻深諳統計技術的後藤新平，顯然也頗知如何向西方人宣傳台灣統治。

後藤新平的專業是醫學，就促成殖民醫學的發展而言，後藤新平可說是台灣衛生與醫療政策的推手。除了推行各項經濟改革和建設工作之外，後藤對台灣衛生醫療制度的重大影響，則是鴉片漸禁政策與公醫設置制度。公醫制度是後藤在推行鴉片政策時所提出的，日治時期台灣的衛生與醫療行政都是屬於警務系統所監管，這也點出了醫學和殖民主義結合的特質。此外，在《台灣統治志》的第八章〈警察機關〉與第十三章〈司法監獄〉可以看出，日據時期的警察，職權掌管範圍之大，幾乎包含了人民生活的全部。不僅是治安刑事上的維持，包括戶口調查、理蕃政策、保甲制度、衛生行政，甚至教育事業都受到警察的監控。在現代性／殖民性的一體兩面之下，台灣人只要不遵守法律或是不符合衛生習慣，都會被警察當作罪犯或病患而遭到隔離。竹越在書中也提到，以進步社會的標準來看，吏務和警務是必須分開的。但是因為台灣的社會狀態還是幼稚的，所以採取嚴厲的法治才能得到效果。因此要以家長式的、恩威並施的政治，隨時讓人民感受到警察的勢力<sup>26</sup>。日治時期的統治策略，即是運用嚴密的警察體系來監控島民的生活與思想。因此警察是最基礎也是最嚴密的監控機制，他們的威權亦被無限膨脹。這種監控方式，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無法遁形。縱使人民表現出對警察的服從，其實是恐懼心態多於守法觀念。當時為了有效管理殖民地的人民，並且協助警察權威的行使，司法監獄、保甲制度等更多嚴厲的法律與規範也應運而生。

如果警察機關是對人民外在行為的管理，學校教育則是培養近代國民的地方。在第二十章〈教育、宗教、慈善〉，作者在開頭即直言：「開導台灣最必要、也是前途最遙遠的，則是教育吧」。台灣人必須透過教育做到移風易俗、改變心性，否則將和「支那人」一樣，追求生活享受與縱情慾望<sup>27</sup>。竹越顯然對中國人懷有極大的偏見，而且將某些人的負面性格擴大成他對全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在他的腦海中，落後中國的破敗身影，除了政治上的腐敗，還包含了人性的墮落。他提到了中國舊社會的拜金主義，而和中國有血緣關係的台灣人，自然也是具有這種劣根性的。此外，對於中國父權家庭的批判，在最後一章〈台灣歷遊雜錄〉，則

<sup>26</sup> 竹越與三郎，〈警察機關〉，《台灣統治志》，頁 245-246。

<sup>27</sup> 竹越與三郎，〈教育、宗教、慈善〉，《台灣統治志》，頁 478-479。

成為他的焦點話題。

作為日本殖民政府治台政績的宣傳文本，《台灣統治志》可以說是一部完全官方觀點的政治文本，只有在此書的末章〈台灣歷遊雜錄〉，才能稍稍窺探作者竹越與三郎對於台灣的旅遊觀感。當他從基隆搭車進入台北城後，歷目所見的是清潔寬大的馬路、規模井然的市區，儼然出現新台灣的氣象。竹越指出，當時的爪哇被稱為世界的公園，但是他認為台灣繼續經營的話，數年之後，台灣不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遊園地<sup>28</sup>。不過，他也特別提到台灣的旅館風格，是殖民地旅行中令他感到不愉快之處。台灣當時的日式旅館不少，但是竹越認為在熱帶地方，西洋式的旅館才是最恰當的建築，然而台灣卻連一間歐洲風旅館都沒發現，這是相當遺憾的。依照竹越的想法，所謂的殖民地，是人們行樂的聚集地，所以應該注重娛樂設施，以達到安慰遊子的功能。因此殖民地經營者首先要規劃的，應該是公園、音樂館等建設<sup>29</sup>。

在近代性的觀察之外，作者對殖民地的異國情調也有生動的描寫，例如渡河搭乘竹筏、坐轎旅行的滋味，還有台灣農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水牛、家鴨、豬群等景象。在本書所附錄的三十八張寫真，有交通、產業、教育、人種、建築、市鎮等各方面的台灣縮影，這些寫真也有如選擇性的觀景窗，當可看出作者對台灣的整體印象<sup>30</sup>。毫無疑問的，台灣的氣候、風土、物產，都有別於日本本土，這也符合竹越對於殖民地的期望，做為國人吸收新鮮養分的地方。這些能夠滋養本國的養分，除了台灣豐富的山林資源、各項專賣之外，也包含了殖民地本身的娛樂功能。在殖民地經營者的持續開發之下，台灣將會成為其他殖民地的典範。然而，這些美好的願景，都只涉及到台灣的自然資源，另一方面，台灣人的文明性卻是竹越批判的對象。

竹越與三郎在旅台期間，非常留意台灣的婚姻制度，這也和他對中國家長制的批判有關。竹越會對這一議題表達高度關切，應該受他的妻子竹越竹代（1870-1944）的影響至深。竹越竹代是活躍在明治時期的婦女運動家，也是日本新聞史上第一位女性記者<sup>31</sup>。竹越竹代所從事的文筆與婦女運動，是她在婚後隨

<sup>28</sup> 竹越與三郎，〈台灣歷遊雜錄〉，《台灣統治志》，頁 503。

<sup>29</sup> 同上註，頁 514-515。

<sup>30</sup> 請參考附錄二：《臺灣統治志》寫真目錄。

<sup>31</sup> 竹越竹代（1870-1944）出生於 1870 年（明治 3），父親是岡山藩士族中村秀人，母親中村靜子則是岡山藩的儒學者石坂堅壯的次女。中村秀人在 1880 年（明治 13）病歿之後，靜子獨力把竹代撫養長大。靜子受其家學影響，不僅資質聰穎而且是一位進步女性，後來皈依為基督教徒後更熱心於禁酒、廢娼等運動。竹代後來也和母親靜子一樣，在 1883 年（明治 16）接受岡山基督教會的創立者金森通倫的受洗而成為基督教徒，先後就讀基督教派所住持的山陽女學校、大阪梅花女學校。她在高等女學校即將畢業之際，透過教友的居中介紹，認識了當時正在擔任新聞記者的竹越與三郎（三叉），在獲得母親的認同之下於畢業後即和竹越與三郎結婚。翌年 1890 年（明治 23）竹越與三郎接受德富蘇峰之邀請，參與民友社的《國民新聞》創刊而回到東京。後來竹代也向《國民新聞》投稿，成為日本第一位的女性新聞記者。1891 年（明治 24）成為東京婦人矯風

丈夫赴東京生活後的活動。原本在大阪公論社執筆政論的竹越與三郎，1890年（明治23）年接受德富蘇峰的邀請，參與民友社的《國民新聞》創刊而回到東京<sup>32</sup>。隨後來到東京的竹越竹代，由此展開她的文筆活動，除了用「竹村女史」的筆名為《國民新聞》撰稿，還以該報記者身份擔任採訪工作，這在當時的社會而言，都是史無前例的。德富蘇峰甚至邀請她為民友社的婦女雜誌擔任撰稿編輯工作，也在此時竹越竹代開始她的婦女運動。1891年（明治24）成為東京婦人矯風會委員，為「一夫一婦的建言書」而盡力奔走。1893（明治26）年加入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設立委員會，和許多婦女運動者一起展開廢妾運動、禁酒禁煙運動等等。竹越竹代也擔任了東京婦人矯風會機關誌《婦人矯風雜誌》編輯，因此竹越與三郎在這段時期常向該雜誌投稿，以側面聲援自己的妻子，這些作品多以探討女性地位為主，例如〈如何提高婦人的地位？〉、〈矯風事業首要之急務〉、〈日本婦人的三世相〉等文章<sup>33</sup>。

從他們夫妻的文筆活動來看，就不難理解竹越與三郎對於中國買賣式婚姻的批判。其時台灣的漢人社會，自然還沿襲著中國傳統家庭制度，女性在家庭或社會上的地位是低微的。就竹越的觀察，他認為台灣女性是稍稍比中國女性享有自由的，但是在婚姻體制上還是不脫影響。最後一章，竹越侃侃而談自己對殖民地的觀察，輔以「舊慣調查會報告」來說明台灣家族中的夫妻關係，娶妻又納妾的實際狀況，也是造成家庭紛亂的根源。誠然，台灣婦女解放運動的起步比日本遲晚，竹越的進步思維也凸顯了台灣人的落後。在文化位階上，相當鮮明地呈現出日本人，臺灣人，中國人的高低排序。接受日本殖民的台灣人，顯然還有進步的空間。但是中國人的血緣、家庭、社會制度等等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和重利的猶太人擁有很多相似點，是民族上的問題<sup>34</sup>。而台灣人和中國人的血緣與文化關係，也相當程度地左右了竹越對台灣人的觀感。

---

會委員，集中精力在「一夫一妻的建言書」，1893年參加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展開廢妾運動、禁酒禁煙運動，這個時期也刊行了《婦人立志篇》、《ウェスト女史遺訓》（維斯特女史遺訓）等作品。1909年（明治42）左右開始傾倒於佛教禪宗，從此展開刻苦修行，後來得到淺草寺的大僧正救護栄海授予「大阿闍梨」高僧資格。享年75歲。

<sup>32</sup> 德富蘇峰（1863-1957）是日本熊本縣水俣鄉士德富一敬的長子，小說家德富蘆花的兄長，本名猪一郎。青少年時期在外地求學的德富，1881年（明治14）回到故鄉創設大江義塾，也在地方新聞等執筆。1887年（明治20）上京組成民友社，創刊雜誌《國民之友》，1890年（明治23）創刊《國民新聞》。德富素以進步民主主義立場從事執筆活動，但是在日清戰爭後成為松方內閣的內務參事官因而遭到非難。1911年（明治44）成為貴院議員，1913年（大正2）離開政界轉向評論家活動。1937年（昭和12）因為《近世日本國民史》一書得到學士院恩賜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富的言論思想以皇室的國家主義為中心，1942年（昭和17）當上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會長，1943年（昭和18）獲得文化勳章。德富在敗戰後被開除公職，晚年在熱海的晚晴草堂直到過世，享年94歲。

<sup>33</sup> 竹越熊三郎編／下山京子著，《竹越竹代の生涯／一葉草紙（伝記・下山京子）》，東京：大空社，1995年12月，頁13-22。

<sup>34</sup> 竹越與三郎，〈台灣歷遊雜錄〉，《台灣統治志》，頁517。

但是有一些內地人，把台灣當作淘金的新天地，懷抱多少荒唐的夢想而來，最終卻敗興而歸。作者在書末提起這件事，無非是忠告他們要認清台灣的現狀。為了撰寫《台灣統治志》，竹越與三郎遂有了他首次的殖民地之旅。竹越所認識的台灣，還是殖民地經營的草創階段。台灣的各種資源，也才正在開發途中。以他對古老中國的偏見，牽動了他對台灣的認識。在他的眼中，台灣不是一座金山，而是一塊尚待啟蒙的蠻荒地。當時的台灣社會，文明程度只能以「幼稚」而論，民智仍需開化。然而他也說，開導台灣最必要、也是前途最遙遠的，就是教育吧。竹越並不是要否認殖民者到目前為止的努力，而是認為台灣距離文明太遙遠了，「教育」肯定是一件艱辛的工程。不過，他在五年後所出版的《南國記》，台灣的蠻荒意象已經被別的殖民地所取代，這個南方之島也出現了轉變。

### 三、《南國記》與南進論

明治中期以降，日本開始發展「南進論」，「南方」的地理方位，是以日本為中心座標，主張藉助「海洋」的力量往南方前進，鼓吹南洋是日本人海外進出最合適的地域。一方面，南進論述也強調，日本前進南方是具有使命性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南洋的未開發性、政治的落後性，也在於向歐美帝國宣示，開發海外殖民地不再是西方的特權。「南進論」的主張，最初雖然是日本帝國發展海外拓殖為目的，到了太平洋戰爭期間卻演變為基本國策，透過國家的直接介入，「前往南方」逐漸成為日本人的集體無意識。「南進論」的傳播方式，顯然不只侷限在國家的政治宣傳之上，也牽涉到龐大知識體系的運作；在各種專業領域上生產的「南方」文本，逐步建構日本帝國的南進論述。本節的重心，就是要探討這條南進系譜的濫觴作品之一《南國記》。

1909年的夏天，竹越與三郎到南洋旅行，翌年出版了《南國記》。這本書在當時引起廣大的迴響，也召喚了許多日本人的南方想像。竹越在序文〈題南國記〉中，描繪了這趟旅程的始末：

去年，我立下志向，從荷領東印度諸島開始，巡遊了法領印度支那，進一步踏入中國雲南省，看了南方的一部分。這趟水陸的路程有一萬餘里，更換了十三次的船，嚐受著艷陽的痛苦、和巨濤奮戰，去程時穿著夏衣，歸程時已著冬衣。此行和歐美旅行相比之下，雖然生活上的愉快較少，但是觸目之風光、歷遊之山川、男女之人情、政治之組織，皆詭異怪奇至極，

是我前後的旅行當中最具興味的。<sup>35</sup>

透過這段序言，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作者航行的地圖。在長達半年的旅程，竹越強烈感受到南方的光與熱，獵奇的異國情趣。值得注意的是，此書並非單純的紀行作品，它深刻地傳達出作者的南進思維。在竹越筆下的「南國」，是南方之國的泛稱，也指喻南方的土地。作者對於南方的追求，在《南國記》第一章的標題「往南！往南！」即表露無遺。翻開第一章，竹越展現了獨特的文筆功力，他以一則寓言起頭，描寫有個獵人總是忙於觀察遠處樹上的鷹鳩，卻不知道眼前草叢中就有巨雉的存在，等到被人提示而往腳下查看時，大鳥早已展翼飛走了。這則故事在影射當時的日本人已然遺忘美好的「南方」，而苦苦追求遙不可企的空想。接下來，他還引了一首詩加以論證：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sup>36</sup>。

不難發現，寓言和詩的涵義都是相似的，竹越的用意在於點醒國人：我等的將來就在眼前的南方，只要能掌控熱帶殖民地就可以制服全世界，根本不需要辛苦北進大陸。《南國記》被評價為是讓日本的大眾階層對「南進論」普及認知的最初作品，原因除了竹越的知名度之外，也和他的文學技巧有關。少年時期就進入漢學塾的竹越，藉由閱讀中國史籍《史記》、《漢書》、《春秋左傳》等經典，奠定了深厚的漢學基礎。17歲時，他上京學習英文，一年之後入學慶應義塾，在福澤諭吉的門下開始大量接觸西方知識<sup>37</sup>。在《國民新聞》的工作期間，他則對世界歷史產生濃厚興趣<sup>38</sup>。竹越個人的知識體系，結合了漢學和西學素養，這種特質也反映在他的作品當中。

1890年到東京《國民新聞》擔任政論記者的竹越與三郎，在這段期間因為創作《新日本史》、《二千五百年史》而得到西園寺公望的知遇<sup>39</sup>，1898年(明治

<sup>35</sup>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に提す〉，《南國記》，東京：二西社，1910（明治43）年4月，頁1-2。

<sup>36</sup> 此詩出自宋代羅大經之《鶴林玉露》，作者為一佚名之女尼，題為〈某尼悟道〉。全詩以「尋春」比喻訪道，起初，不得入道之法，向東向西，四處尋找佛法真諦。在歷經芒鞋踏遍各地之後，才領會到佛法就在自心，不用向外去求。

<sup>37</sup> 福澤諭吉（1835-1901）是日本明治時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積極提倡當時正值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應該放棄中國思想和儒教精神，「脫亞論」是福澤諭吉於1885（明治18）年3月16日在日本《時事新報》發表的著名短文。

<sup>38</sup>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7，頁59-60。

<sup>39</sup> 西園寺公望（1849-1940），號陶庵，宮廷貴族清華家出身，德大寺公純次子，過繼西園寺師季。1971年（明治4）留學法國，1880（明治13）年回國後開辦明治法律學校（明治大學前身）。20世紀初期與桂太郎交替出任首相，1912年（明治45）任最後一任元老。逝世後舉行了國葬。

31)進入政壇，在伊藤內閣的西園寺文相之下擔任文部省勅任參事官兼秘書官，翌年渡歐到各國視察，另外他也以「竹越三叉」的筆名從事政治評論活動。透過這些履歷，不難推測出他受邀執筆《台灣統治志》的契機。竹越 1910 年所出版的《南國記》，紀錄了南洋旅行的見聞所感，論述範疇包括了上海、廣東、香港、新加坡、爪哇及荷屬諸島（今印尼一帶）、法屬印度支那、台灣等地<sup>40</sup>。這本書不僅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政情有敏銳的觀察，也是一部帶有異國情調的遊記。此書出版後相當暢銷，一年多的時間就再版十次，如此迴響是異常程度之大的。這本書在當時也引起了大眾媒體的注目，主要的報章雜誌登出不少書評，而且對於竹越的主張大多給予積極的評價，可見這本書帶給社會極大的衝擊<sup>41</sup>。

以海洋作為移民或殖民的途徑，竹越在《台灣統治志》已經展現這種思維，《南國記》則將海洋連結南方作為概念，說明日本前進南洋的必然性。經由第一章〈往南！往南！〉的幾個小標題「國人忘卻南方」、「控制熱帶就是制服世界」、「島國在大陸上用力之不利」、「吾等之將來在南方」等等，可以看出他極力主張日本南進。他以世界史的興衰來說明「南方」的優勢性，更以日本民族的血統中混合了馬來人種的血液來聯繫日本和南洋的關係：

我們曾經在小學時被教導：「凡此地球上之人種可分為五，曰歐羅巴人種、蒙古人種、阿非利加人種、馬黎人種、亞米利加人種是也」。而此馬來人種居住於與大日本帝國南端相望之地，儘管他們血液的一部份混入我南方臣民的脈管之中，我國人卻把這擱置一旁，對他們馬來人的理解相當少，卻徒然談論歐美、中國為多，這豈不是求之高遠而失之卑近嗎。<sup>42</sup>

當時日本關於民族起源之議，眾說紛紜，但是許多論調都和日本帝國發展有密切關聯。人類學並非竹越與三郎的專業領域，不過他在其著作《二千五百年史》就主張「日鮮同祖論」、人類學的「混合民族論」，《南國記》則以日本天孫民族從南方而來，且舉日本和南洋在某些風俗的類似為例，指出日本人的血統當中也混合了南方的馬來人種。這也是為了和北進論（大陸進出）對抗，所以提倡日本應該往民族的故鄉「南方」前進<sup>43</sup>。馬來人位居「南方」的座標位置，是對應日本本土的地理而來。馬來人所處的南洋群島不僅僅和日本比鄰，它也是作者眼中大且富足的殖民地。竹越提出日本民族和馬來人之間的血緣關係，是要強調

<sup>40</sup> 請參閱附錄三：《南國記》章節目錄。所謂的「印度支那」是指中南半島（含馬來半島），也特指曾經是法國殖民地的「法屬印度支那」，包括今天的越南、柬埔寨、寮國。「印度支那」一詞是音譯自法文「Indochine」，表示位於印度與中國之間並受兩國文化影響的區域。

<sup>41</sup>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頁 61。

<sup>42</sup>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 2-3。

<sup>43</sup>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の起源》，東京：新曜社，1995，頁 98-99。

往南洋發展的合理性。相較於日本人普遍對歐美、中國等國的文化、國情有相當認識，但是對於和日本民族有血緣關係、在日本南端遙遙相望的南洋島人卻一無所知，這不是捨近求遠嗎？竹越運用了他的世界歷史知識，建構出日本民族起源與南方的關係，無非是要以此支持他的南進論。但是就人類學的觀點來看，竹越的人種知識充滿了謬誤。

《南國記》引起爭議之處，倒不在於竹越所提出的混合種族論，而是他對馬來人的誤解；竹越關於馬來人種的定義，遭到人類學者鳥居龍藏的駁斥：「曰馬來者何。最後應注意者。係曰馬來者果何歟。生番之謂為馬來者。係西洋學者。自言語而研究之者。又據竹越與三郎氏所著南國記。則明謂安南東堡塞邊之民族為馬來。山路愛山氏之日本人種論。亦謂支那安南之人為馬來。是則以印度支那派之民族與馬來種族。混同而譯之者。其謬可知。」<sup>44</sup>其實，不只是竹越與三郎，當時詮釋馬來人種的歷史學者也另有其人，山路愛山就是其中一位<sup>45</sup>。竹越可說是南進論的混合民族論者，山路則是北進論的混合民族論者，彼此的立場雖然是對立的，卻不約而同地利用馬來人成為他們知識操作下的犧牲者。相當明顯的，兩人踰越自身的歷史專業領域而涉入了民族人類學的非專業範疇，他們發展出來的南進／北進論述，其實都是日本人企圖統治未開的土地與民族之事業的一部分，文化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權力運作也在於此。

《南國記》的暢銷程度，顯示出日本人對於南方的好奇與窺伺，也可大略了解它在南進論的影響力。《台灣日日新報》在 1911 年 12 月 16 日的〈東京消息〉提到：「竹越氏的『南國記』多少有談到台灣，此書尚且受到許多讀書人的歡迎，這是可賀之事。但是其他關於台灣的有益著書，如當初的台灣史料、南疆譯史、台灣鄭氏記事、行在陽秋、淡水廳誌、台灣府志、台灣蕃政志、台灣教育志稿等書，現在的則像台灣總督府所編纂的台灣統治綜覽，都依然束之高閣，對殖民地台灣來說是遺憾的。」<sup>46</sup>由於《南國記》其中有一個章節是討論台灣殖民現狀，這則消息認為《南國記》的眾多讀者也會看到台灣書寫的部分，肯定對宣傳台灣是有幫助的，但是其他和台灣相關、甚至是由台灣總督府所負責編纂的書籍卻乏人問津，對於編纂者的用心來說是相當可惜的。這個報導雖然是以台灣為出發點而寫的，但是《南國記》並不是因為書寫台灣主題而受到注目，它論及的內容涵蓋了整個東南亞區域。透過這則新聞，一方面凸顯《南國記》被日本人廣泛喜愛閱讀，一方面也可側面了解竹越的文字魅力。

<sup>44</sup> 鳥居龍藏氏講演，〈生蕃人種之調查法〉，《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 年（明治 44）2 月 10 日。

<sup>45</sup> 山路愛山（1865-1917）本名彌吉，號愛山，是活躍於明治到大正初期的評論家、民間史家，和竹越與三郎是民友社時代的同事。當時山路愛山主張北進論的混合民族論，竹越與三郎則是南進論的混合民族論。

<sup>46</sup> 社外記者，〈東京便り〉，《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明治 44）12 月 16 日。

在《南國記》的描寫下，未開化的南洋諸島，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一頁。不難想像在日本人眼中，竹越所提到的極樂鳥、龍涎香、麒麟血、山竹果、荔枝，這些前所未見的名詞，不但帶來獵奇的趣味，也引起他們的南方想像。《南國記》是一本深具異國情調的遊記，紀錄了作者在東南亞各殖民地的所見所聞，而且他的書寫風格相當明快生動，從南方各地的歷史文化談起，到風土、物產、民情，再搭配上各地的人物寫真圖片，使讀者在閱讀文字之餘，隨即能透過視覺的接收進入情境。相較於《台灣統治志》大量的統計數字與圖表排列，《南國記》則放重在南方的文化風情，從第二章到第七章，竹越介紹了上海居留地、香港、廣東，以及東南亞各殖民地，綜論南洋各地的歷史與地理知識，盡情發揮了作者的文史專長特色。另一方面，本書的書寫策略也是相當鮮明的，它的目的在宣揚作者的南進論觀點，所以在每一章的後半，作者都會探討當地的政治狀況，並且分析各殖民母國的殖民政策之優劣。作者的用心，除了參考歐美各國的統治手段，還有和他們一較長短的企圖。南洋的豐富資源，自然不能坐視讓西方帝國獨占，這也是竹越積極主張南進論的原因。

對於竹越的南進論調，大多數的輿論是持肯定立場的，這也多少可以看出日本的政治意向，但是其中也有極少數的負面評價。在一篇名為〈輕率的日本人〉的政論，作者田原生批評了竹越的《南國記》與贊同南進論的日本人：「竹越代議士之所論，是自我欺騙、自家擅著，有識者是讀後一笑置之的。但是這本書卻被多數浮躁虛華的日本人所歡迎，陷入聘馳於樂觀空想者多矣，令人不得不感嘆。」<sup>47</sup>作者指出，南進論是太過輕率的主張，當前應該做的，是引導國民走向自知之道，並且藉由認真勞動以循序漸進，但是如此急進的南進論調，卻被多數浮躁虛華的日本人所歡迎，真是令人感嘆的事。《台灣日日新報》所發表的這篇文章，足以說明 1911 年（明治 44）左右，南進論尚在萌芽的階段。日後它以勢如破竹的氣勢壓倒各種言論時，官方主導的報章雜誌上也難得會出現這種反對南進論的文章了。

1914 年（大正 3）第一次世界大戰勃發之際，日本加入了戰局並且向德國宣戰，旋即佔領了德屬南洋群島。自此以降，日本的南進經營論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真正據有了的土地。在第一次的佔領後，日本迅速拓展在南洋的勢力範圍。透過竹越在 1916 年（大正 5）所發表的一篇〈南洋進展策 支那人歸化案〉，當可看出日本發展南進政策的進程：「予遊南洋。因唱南進政策。前後不過七年。而我國人在南洋地方之企業。經已非常勢力前進。當初僅在馬來半島。今已擴張到蘭領『浩屢黎塿、斯馬特拉』殊可忭喜。」大正時期日本推動南進政策的重心，主要是在南洋進行拓殖經濟。南洋的重要物產橡膠，也就是塑膠的原料，成為日

<sup>47</sup> 田原生，〈輕卒なる日本人〉（下），《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明治 44）1 月 15 日。

本發展南洋實業的重心，但是當時卻有勞力人口不足的問題。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竹越與三郎建議招攬中國人到南洋工作，並讓他們歸化成日本人作為利誘：

現我日本人在蘭領地方。與歐洲人種。同受優等國之待遇。支那人則與印度人種。共蒙劣等國之藐貌。其中不耳。實為匪少。間有兄為支那籍民。弟為台灣籍民。兄弟之中。其待遇即不同。以台灣人亦日本民也。故其權利利益。隨之而異。現在南洋僑居支那籍民。相率欲為日本人者。已非一日。若令雇用于日本人事業或受其資助者。便可坐得日本籍。則勞働者無不靡然羣集於我事業。蓋此法嘗于暹羅實行之。予惟欲令我政府。一為倣效之耳。又此項章程。總要規定為經過僱用年限若干。始能取得國籍。而其國籍又要限在蘭領之內。去此則失。我國自有植民地以來。國籍之中。全不分載為登錄國民。抑植民地國民。與帝國臣民。頗為疎漏之點。此後宜設此制度。並以助長我南進實業策也。<sup>48</sup>

為了獲取勞力資源，竹越建議招徠中國人來南洋，並以入日本籍為獎勵。但是，顯然這種入籍方式是差別性與利益性的考量。竹越提出的方式，必須要有一定僱用年限始能取得國籍，而其國籍又要限在荷屬領地之內，這無異是以日本的利益為主的條款。其次，所謂的「帝國臣民」、「植民地國民」、「登錄國民」，如名稱所示，就存在著身分差別，也象徵了位階高低以及國民權利的多寡。當時是否真如竹越所說：「現在南洋僑居支那籍民。相率欲為日本人者」頗令人存疑，不過這篇文章也點出了另一個議題，那就是中國人和台灣人的身分位置。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雖然是被殖民者的身分，竹越認為其地位是比中國人高一等的。這種匪夷所思的現象，也說明了台灣人和中國人的政治處境。

竹越與三郎在 1909 年所展開的東南亞之旅，以台灣作為終點站，畫下圓滿的句點。曾經於 1904 年為了寫作《台灣統治志》而來到台灣，五年後再度重遊殖民地，竹越驚奇地發現台灣有了神速的進步。《南國記》的第八章〈從印度支那到台灣〉以台灣發展為主題，在作者的觀察下，無論是和五年前的台灣相較，或是和東南亞各方的殖民地對比，現在的台灣都展現了近代化的優勢。從基隆港的規模到台北街道的革新，都市下水道、電力設備的整頓，甚至是台北官設旅館的美觀舒適，都讓竹越讚嘆不已。並且，在愉快的鐵道旅行中，他沿途參觀台灣西部的製糖會社、甘蔗園，感受到伴隨工業而來農業的進步，而番地開拓也擁有

<sup>48</sup> 竹越與三郎氏述，〈南洋進展策 支那人歸化案〉，《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6 年（大正 5）年 2 月 4 日。

相當成績，這一切都歸功於日本殖民政策的各項創見。在竹越的描寫之下，台灣儼然是一個充滿和平歡樂的殖民地。其中，他最謳歌的製糖會社，被形容成兼顧蔗農權益與經濟收益的良心事業，這無疑問和台灣人的理解有極大落差。竹越的論調，極其美化台灣統治之能事，他是為了和歐美各國的殖民政策一較長短，企圖形塑超越西方統治的殖民地。

因此，在旅行過東南亞各國後，竹越確信台灣無論談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或人民生活水準各方面，都比其他各殖民地還要傑出，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在殖民政策上的耕耘。《南國記》把台灣部分放到第八章來談，其用意就是要比較出各殖民政策的優劣、殖民地人民的差別待遇，從而肯定日本在台灣統治的政績：

看到荷蘭、法蘭西等國家如何在他們的殖民地壓榨土人、虐待中國人，這和台灣土人境遇相較的話幾乎是天壤之別。在台灣不論是本國人或土人，在政治上都一視同仁、沒有區別<sup>49</sup>。

對台灣人來說，這段話的可信度頗低。只要稍微理解殖民史的人都知道，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台灣人的生活境遇乃至於基本權利，從來就不可能做到和日本人一視同仁。在同化政策上抱持反對立場的竹越會說出：「在政治上都一視同仁、沒有區別」，乃是希望藉此凸顯日本殖民政策的人道主義。不過，無論竹越是故意掩飾真相，或者他真心認為台灣人被一視同仁的對待，他所說的話是有可能被廣大讀者相信的，尤其是不熟悉台灣狀況的內地日本人。這些宣揚台灣統治的帝國文本，更能透過翻譯的形式傳播到海外，而成為再現殖民地的樣本，也滿足了一般人所懵懂認知的南洋。竹越的《南國記》提到，他搭乘地洋丸在前往台灣的途中，船上英美旅客三十多人當中，就有兩人看過《台灣統治志》的翻譯本<sup>50</sup>。另外，據說《南國記》後來也被翻譯成法文，連荷印總督都看過此書<sup>51</sup>。可見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力量是無法輕忽的，竹越雖然沒有豐富的南方生活經驗，但是憑藉個人的史學知識與文字專長，企圖透過書寫再現殖民地的全景。竹越佔據了發言位置，也就擁有詮釋權。利用文字，他也掌控了更多的殖民地知識。

誠然，台灣是南進政策的起點，《南國記》的主題還是以「馬來人」為主。占領台灣讓日本開始學習如何經營殖民地，進而將台灣經驗挪用在其他殖民地的治理之上。《台灣統治志》的書寫工程，讓竹越掌握了殖民地政策的運作方式，在《南國記》的書寫策略上，竹越則將帝國的目光投向南洋群島。為了使南進論更具有合理性，竹越在書末再次提起日本人和馬來人的血緣關係，並以此設問：

<sup>49</sup>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 320。

<sup>50</sup>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 285。

<sup>51</sup>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頁 63。

如果日本人和馬來人親密到有共同的祖先，為何今天日本已位居世界大國之列，而和日本人同胞同系的馬來人卻在南洋地方過著奴隸狀態的生活：

說明這個問題嘛，馬來人是純粹的馬來人種再多少混入了劣等的黑色人種而已。可是日本人為了和中國大陸、朝鮮半島而來的稍高等人種相接合，所以興起血統混合，結果成為如今日般的大國民。<sup>52</sup>

竹越顯然對「黑人」懷有極大的偏見，這應該和他接受西方歷史訓練有關。馬來人因為混合了黑色人種的血統，所以才會變成更加劣等的人種。而日本人則選擇性地混合了多種族的血液，最後成為現在這般優等的國民。緊接著他提到了馬來人居住的熱帶地區有取之不盡的天然資源，加上四季都是暑熱的氣候，所以人們不用辛苦勞動、終日懶惰過活，大腦無需思考、只要依照「飲食男女」的動物本能即可生存下去。這也是南洋地方人文不發達、無法產生文學的原因。竹越在最後所提出的文學觀：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sup>53</sup>，就是期許自己能夠以文學的力量，引導國人未來的方向。

近代日本帝國的未來將往何方？日本國民的明日將在何方？這兩個議題恐怕是明治時期以降日本官方與民間都亟欲找尋的答案，我們也可以從《南國記》的書寫脈絡中感受到這種迫切的心情。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積極朝向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近代國家樣式，一方面也開始模仿西方帝國主義的發展路線。竹越與三郎遊歷東南亞之後，以《南國記》向國人宣告：日本的未來在南方，憑藉日本人和馬來人的血緣關係，日本到南洋發展的條件絕對比西方帝國更有優勢。而且，日本在台灣統治的成績，無論是人民的生活水準或是文明的改造程度，都比東南亞各個殖民地還要成功，這足以印證日本有能力成為明日帝國之星。為了凸顯和各殖民地的差異，《南國記》的台灣再現，顯然比《台灣統治志》更趨向正面的展示，這是作者的書寫策略，也透露了強悍的帝國慾望。

#### 四、前進南方：一種政治無意識

竹越與三郎的台灣與東南亞之旅，為他激盪出繁複的南方想像，也豐富了他的南方知識。在旅行的過程當中，他絕非一位單純的旅者；「觀光」不是他的目的，「觀察」才是他的重點。或者說他是以一個近代旅者的姿態，帶著文明性

<sup>52</sup>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 358-359。

<sup>53</sup>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 366-369。

與殖民性的雙重目光，來凝視台灣與東南亞各殖民地的風景。他能夠周遊南洋，和他在政界的權力有關。有了權力便有能力到達這些殖民地，再藉由竹越本身的史學專業，以此考察東南亞各殖民地的狀況，然後透過文字再現殖民地的風貌。

《台灣統治志》的書寫目的相當明確，是為了宣傳日本殖民政策而寫。《南國記》則不僅是極具異國情調的遊記，在文學性之外也明示了作者的南進觀點。這兩個文本是竹越編纂與傳播的南方知識，是帝國書寫的一部分，也讓他掌握了殖民地的詮釋權。對於南方的一切，竹越顯然懷有強烈的憧憬。但是他所憧憬的，不是南方的光與熱，而是征服與支配。

對正在發展帝國主義的日本而言，台灣統治是一個試金石，以此檢驗日本是否具備開化蠻荒的能力。無可否認的，《台灣統治志》縱使對台灣的未開程度有所擔心，但是作者毫不遲疑地正面肯定日本。台灣統治的成功，也激發了無限的帝國欲望。竹越在《南國記》的書寫策略上，以台灣經驗為墊腳石，主張藉由海洋的力量往「南進」，才是當今日本人的使命。相當鮮明的，《台灣統治志》的台灣意象是從蠻荒未開到半開。《南國記》的台灣再現，已從半開躍進到開化的近代社會，較諸東南亞各殖民地更具文明進步，其書寫企圖是不言而喻的。台灣作為日本南進政策的起點，它的指標性意義在於提供一個殖民地典範，甚至超越西方帝國在南洋的各殖民地。和歐美帝國發展史相較之下，雖然日本起步甚晚，但是日本以台灣統治為開端，展現了向西方模仿到競爭的企圖。

分析《南國記》的書寫脈絡，作者顯然已有遲到的焦慮。當時日本是帝國主義剛要起步的階段，日本列島的地理環境則四面環海又南北狹長、高山縱橫，因此竹越也在思索：日本帝國的未來將往何方？日本國民的明日將在何方？我們不禁可以從《南國記》中感受到這種迫切向前的心情。和西方相比的話，日本的近代性是遲到的。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以「脫亞入歐」的決心積極向西方學習，希望能脫離漢文化圈的萎頓狀態。竹越與三郎在慶應義塾時期，成為福澤諭吉的門下。當時積極鼓吹學習西方文明觀的福澤諭吉於 1885 年（明治 18）3 月 16 日在日本《時事新報》發表著名的短文〈脫亞論〉，強烈建議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應該擺脫中國和朝鮮這兩個鄰國：

為今之計，不能猶豫於等待鄰國開明之日再共興亞細亞，不如脫離他們的隊伍而和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方面也不必因為是鄰國的緣故就特別理會，只要按照西洋人應對他們的態度就可以了。與惡友親近的話則難免也會有惡名，我們要在心裡謝絕這種東亞的惡友。

這一段話是〈脫亞論〉的結論，也是福澤諭吉以文明性來檢驗中國和朝鮮

的定見。他主張應在亞洲的東邊，創立一新西洋國日本，成為亞洲的新領導者。而對於像中國、朝鮮這些鄰國，既然它們還停留在半開化階段，日本自然不能與之為伍，而應脫離它們停滯、落後、愚昧的行列，加入進步、文明的西方陣營。對於文明論、人種優劣的概念，福澤諭吉完全是西方思維的，而他的「脫亞入歐」也成為日本在明治時期拓展政治外交的意識形態。有關竹越與三郎在文明開化的思維模式，或是對黑色人種、中國人種的歧視，明顯受福澤諭吉影響甚大。竹越在他的著作中曾露骨地表達在文化上及種族上對中國的歧視，這也是對漢文化圈與儒家傳統的否定<sup>54</sup>。因此，明治中期以降的南進論述，可為日本實踐脫亞入歐提供一個前進的方向。

明治時期的南進論，強調南洋的未開化性，主張日本有開發南洋的使命。大正時期的南進論，則利用實利主義的利潤與持續獲利的希望向廣大日本人號召，藉投資、開發南洋以增進日本經濟發展。到了昭和時期，「南進」逐漸演變成為基本國策，和大東亞戰爭共進退。不難發現，從明治到昭和時期的南進論述，隨著時局的變遷而有所變化。然而，在南進論述的建構工程中，製造「南方憧憬」是始終必要的條件。竹越在《南國記》裡，質疑歐美先進諸國的李洋開發能力，指出日本開發南洋的妥當性。他是透過南洋的未開性，以及日本人和馬來人的淵源，來加強自己的論調。這本書的問世，也為日本人提供一個想像南方的方式。但是換個角度來說，對中國人始終不抱好感的竹越，在大正初期的那篇文章〈南洋進展策 支那人歸化案〉中，會提出以入日本籍吸引中國勞動人口來南洋工作的方法<sup>55</sup>，這也側面顯示了日本進出海外拓殖的一個困境；如何讓更多的日本人（包括殖民地的人民）志願前進南方？這也是南進政策當中，一個最根本的核心問題。《南國記》所建構的南方憧憬，應該有達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這個論述必須延續下去，讓它漸漸轉化成為日本人的集體無意識。

就像西方人發現東方一樣，日本也積極地去發現「南方」。明治中期的南進論者當中，竹越與三郎只是其中的一位。最初，這套論述顯然是由一些經濟史、歷史學家所發起，可以說是關於南方／殖民地的風土民情、歷史想像的總起點，像是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志賀重昂的《南洋時事》。後來慢慢加入不同領域的專家，他們建構各種描述殖民地的文本。從而，在文化與帝國主義的相互運作之下，南方概念的挪用，不需要親自前往也能透過南方論述的文字力量，而達到神往的境界。但是這種南方想像，也極有可能轉化為日本人再現南方的刻版印象，諸如南洋的蠻荒未開性、馬來人的怠惰性格、台灣原住民的兇暴本質，都可成為

<sup>54</sup> 本文前述針對此點已有著墨，立如竹越與三郎在《台灣統治志》中反覆批判中國人愛錢的本性，並與猶太人相提並論。

<sup>55</sup> 竹越與三郎氏述，〈南洋進展策 支那人歸化案〉，《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6年（大正5）年2月4日。

一再被展現的南方樣式。

如同我們可以輕易在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當中，發現南方／殖民地概念的挪用，以及他們對台灣原住民展現的高度興趣。例如，竹越與三郎在《台灣統治志》裡曾經談過殖民地的「慰安」功用，後來作家中村地平在他的散文〈旅人之眼〉中，也提出要把台灣全島國家公園化，以成為撫慰南進者的休憩之地：「既然台灣是軍事、經濟的南進基地，那麼同時更必然是南進之人的慰安之地」<sup>56</sup>。不論中村地平有沒有親自閱讀過竹越的著作，殖民地的慰安／遊樂園功能，顯然已經成為日本人思考殖民地的方式之一。此外，《台灣統治志》所附錄的人物寫真，網羅了台灣原住民各族男女，可見作者把原住民展示當作重點介紹的意圖相當明顯。蠻荒的未開意象和台灣原住民的原始野性，對日本人來說是深具獵奇的異國情趣的<sup>57</sup>。也難怪作家佐藤春夫曾經說過：當時大部分的日本人，都以為在台灣居住的全是「蕃人」，因此要在文章中特別說明台灣籍民是「支那人」<sup>58</sup>。這些例子足以說明，台灣／南方概念可能被簡約化，並與「蠻荒」、「熱帶」、「番人」、「野性」等劃上等號。而作為亞洲唯一新興的近代國家日本，它的使命就在於「啟蒙」或「開化」這些亞洲的落後地區。

## 五、結語

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中，絕非僅限於國家機器的運作，也得力於各種不同形式的協力。在摸索的階段中，竹越與三郎的南方書寫，無異是日本嘗試建構南方主義的肇始之一。如同矢野暢所說的，日本的南方經略或南進論述，在江戶時代就有相關的思想言論，但是具有近代性意義的南進論，要到明治中期以降才真正誕生<sup>59</sup>。南進論或者南方主義，是一種逐漸形成的論述，絕非一蹴可成的工程。明治中期開始，藉由各種專家之手，留下許多南方知識的文本紀錄；從懵懂未明到清晰可見的「南方」，再現一個非常龐大的南方實體，讓日本人可以輕易看見、掌握，進而形成一條政治無意識的南進系譜。無可否認，竹越的《南國記》只是這條南進系譜的濫觴之一而已，這條系譜也未必存有師承關係，它可以透過閱讀、再閱讀，呈現、再呈現的方式延續下去，讓前進南方／殖民地概念，

<sup>56</sup> 中村地平，〈旅びとの眼—作家の見た台灣〉，《台灣時報》，1939年（昭和14）5月號。

<sup>57</sup> 請參考拙作，〈南方與蠻荒：以中村地平的《台灣小說集》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八期，2006年6月，頁147-176。這篇論文有探討日籍作家對於台灣原住民題材的偏愛。

<sup>58</sup> 佐藤春夫，〈南方記行〉，《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7卷，京都市：臨川書店，1999～2000年，頁14。

<sup>59</sup>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頁48-49。

形成一種集體的政治無意識。

西方所建構的東方主義，是一套龐大的知識運作體系，也是在長遠的歷史時空中進行的。然而，日本近代帝國版的「南方主義」形成的過程則在明治時期以降才開始塑形。在明治時期的南進論者中，志賀重昂和竹越與三郎這兩位人物是值得注目的，因為他們的論點有別人無法取代的特點。不過，在當時曾經造成廣泛影響的這兩位作家，對現今的日本大眾階層來說，恐怕卻是陌生的。一般的知識份子可能比較熟悉志賀重昂的代表作《日本風景論》<sup>60</sup>，因為這本書有回歸東洋風景意識的美學價值，《南洋時事》已被大眾遺忘。至於台灣的狀況，則是以竹越與三郎的《台灣統治志》較為研究者所週知<sup>61</sup>，《南國記》卻幾乎沒有相關研究。如此看來，志賀重昂的《南洋時事》、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縱使曾經是日本南進論述的初期力作，現在似乎已隨著人們對戰爭記憶的褪色，而隱沒在歷史激流當中。但是換個角度來看，《南洋時事》和《南國記》所展現的台灣及南方思維，也可以被不同的文本挪用衍化，而延續它們的南方再現模式。對大正、昭和時期的許多日本作家而言，他們不必透過閱讀《南洋時事》和《南國記》，就可以輕易想像南方的光與熱、熱帶與叢林、毒蛇與瘧疾、蠻荒與落後、等待啟蒙與被救贖……。

<sup>60</sup> 請參閱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志賀重昂全集第4卷），東京都：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5年復刻版（根據1928年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發行之版本複製）。以出版市場來觀察，日本岩波書店在2006年還繼續再版《日本風景論》可見此書的經典地位。

<sup>61</sup> 不過，《台灣統治志》也很稀少，近年來以竹越與三郎為主題的研究論述，據筆者所知，只有中研院台史所張隆志博士的論文。請參閱張隆志，〈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台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1895-1945）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台文所、音樂所主辦，2005年11月26日。（本論文為張博士在國科會「世變中的啟蒙：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1895-1949）」整合型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論文初稿僅供討論，不得引用。）這篇論文主要側重在竹越與三郎的《台灣統治志》和後藤新平治台政策之間的關係。

本節附錄表一：《臺灣統治志》章節目錄

第一章：殖民及殖民國	第十二章：鑛物
第二章：在台灣的日本統治	第十三章：司法監獄
第三章：台灣統治法制上之觀察	第十四章：人口問題及國家營業主義
第四章：過去的台灣	第十五章：生番的狀態及番地開拓政策
第五章：台灣的地勢、自然、人種	第十六章：產業
第六章：土地調查及大租權整理	第十七章：交通、郵政、港灣及船舶
第七章：財政及經濟	第十八章：外國貿易、與母國的商業及通貨
第八章：警察機關	第十九章：衛生
第九章：鴉片專賣	第二十章：教育、宗教、慈善
第十章：食鹽專賣	第二十一章：台灣歷遊雜錄
第十一章：樟腦專賣	附錄一、有關台灣著書目錄。二、相片解說。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年（明治38）。

本節附錄表二：《臺灣統治志》相片目錄

1、兒玉台灣總督	10、惜字塔	19、深坑廳屈尺原住民
2、後藤台灣民政長官	11、新高山	20、阿里山番地的情景
3、台北停車場正面	12、安平鎮製茶試驗場	21、宜蘭廳小湳澳腦寮
4、大稻埕祭禮	13、打狗港內之景	22、台灣各族原住民(14張)
5、台灣軍事中的郵件搬運	14、台中葫蘆墩竹筏渡河	23、淡水川養鴨
6、台南城內紅毛樓	15、南庄大東河隘寮	24、荷領期原住民的羅馬字
7、台南市街	16、恆春廳西門	23、民政長官官邸
8、苗栗廳大安溪輕便鐵道	17、台灣的學校(2張)	24、從總督官邸的屋頂鳥瞰
9、彰化廳鹿港市街	18、滬尾水源池	全台北市

本節附錄表三：《南國記》章節目錄

第一章：往南！往南！	第六章：法屬印度支那
第二章：上海居留地	第七章：南方亞細亞的明日
第三章：香港及廣東	第八章：從印度支那到台灣
第四章：新加坡	第九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第五章：爪哇及荷屬諸島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東京：二酉社，1910年（明治43）。

## 第二節 民間觀點・認識台灣

### 中村古峽〈到鵝鑾鼻〉、〈來自蕃地〉的南方風情與「蕃地」體驗

#### 一、引言

近代旅行書寫的研究，是目前頗受關注的主題，作家透過旅遊活動所留下的紀錄，再現了文學者的美感經驗，進一步也讓讀者藉由他人的目光來想像異鄉。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雖然具有濃厚的政治動機，卻也擁有旅行文學的特質。邁入大正時期的日本，伴隨著經濟與政治勢力的擴張，帶動了海外旅行的風潮，殖民地台灣也在這股浪潮當中，成為日本人的重要觀光景點之一<sup>62</sup>。東大文學科出身的中村古峽（1881-1952）<sup>63</sup>，在 1913 年初（大正 2）來台灣旅行，透過這個契機，他認識了第一任妻子小畑照世，還留下兩篇台灣相關作品〈到鵝鑾鼻〉（1913）與〈來自蕃地〉（1916）。年輕時立志從事文學的中村古峽，在 35 歲之前創作與翻譯了許多文學相關作品，但從 1916 年以後文筆卻開始轉向，幾乎以心理學著作為主，後來他是以心理學者、精神醫學者聞名<sup>64</sup>。

〈到鵝鑾鼻〉與〈來自蕃地〉所描繪的風景，是作者深入屏東與台東原住民部落的親身經歷。作品的特殊性即在於作者所行經的地方並非一般觀光客容易到達的景點，在當時交通不便的狀況下，中村古峽是以「探險」的心情，來完成這些行旅。為何中村古峽要費盡千辛萬苦，走到台灣最南端去參觀鵝鑾鼻燈塔？他又是何種心情來到牡丹社事件發生的所在地？這些始末，透過他的文字或許可以得到解答。返日後，他在該年 6 月即發表了一篇台灣屏東紀行〈到鵝鑾鼻〉

<sup>62</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2005 年，頁 347。

<sup>63</sup> 中村古峽（1881-1952），文學者、心理學者、精神醫學者，1881 年（明治 14）出生於日本奈良縣。高中肄業後，以同等學歷考上東大文學部（專攻英國文學），並且投入夏目漱石的門下學習文學。由於弟弟義信的精神異常問題，後來他一邊執筆創作，一邊也在品川的御殿山從事心理療法的的工作。四十歲以後，他開始在東京醫專（現在的東京醫大）學習醫學，也在千葉大學醫學部研究精神醫學，然後自行開設診療所。中村古峽的著作以變態心理學聞名，著有《變態心理の研究》（1919）、《迷信と邪教》（1922）、《變態心理と犯罪》（1930）、《流言の解剖》（1942），並翻譯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日文版，1929）。關於中村古峽的詳細生平，請參閱本章附錄二：「中村古峽年譜」。

<sup>64</sup> 關於中村古峽的創作方向，請參閱曾根博義編，〈中村古峽著作年表〉，收入小田晋編，《『變態心理』中村古峽——大正文化への新視角》，東京都：不二出版，2001 年 1 月第一刷，頁 207-219。透過其著作年表可以發現，中村古峽在 1916 年之後，致力於變態心理學研究。

<sup>65</sup>。〈到鵝鑾鼻〉是紀錄中村古峽從阿猴（現今的屏東市）行至鵝鑾鼻燈塔為止的旅行紀錄。在〈到鵝鑾鼻〉的第一段，即提到他對鵝鑾鼻的深刻關心；1913年前往台灣的途中，他受到一本書《台灣案內記》介紹的鵝鑾鼻所吸引，也因為這裡是「帝國最南端的海角」，所以他決定要前往一探究竟。中村古峽後來果真完成自己的宿願，甚至在看完鵝鑾鼻燈塔之後，又決定要東行到牡丹社。隨後的台東之行，也促成了〈來自蕃地〉這一篇小說的誕生。

如果參照〈到鵝鑾鼻〉的內容，可以發現 1916 年的〈來自蕃地〉，不僅是一篇紀行文體的小說，也是作者根據 1913 年的旅台經歷所寫成，兩篇作品具有相當高的互文性。〈到鵝鑾鼻〉是作者從屏東到台灣最南端的旅行紀錄。〈來自蕃地〉則是紀行文體的小說，聚焦在幾個事件來架構小說的發展；在旅途一開始，主角來到在日本人尚有強烈印象的「牡丹社事件」所在地，故事的進行是主角以書信的方式，向日本友人描述自己到台灣東部原住民部落旅行的過程。小說的另一個高潮，是主角在旅行途中認識了曾經在 1910 年（明治 43）被送到「日英博覽會」作人種展示的一位原住民男性。透過參與日英博覽會人種展示的原住民，作者以正面描述的方式，再現了當時博覽會的盛況。除了這位原住民，主角在旅途中和不同部落的原住民邂逅，並且細膩描寫對他們的觀感，顯然以此作為「異國情調」的反覆旋律。在故事的最後，主角還參觀了一位頭目家的人頭陳列架，舉目所見的幾十顆人頭，呈現出形狀各異的骨骼架構。主角一邊凝視著架上的人頭，一邊思索他們被砍下的那一瞬間，持刀砍頭的「蕃人」是以多急切的心情來完成這件事？隨著主角的想像，小說也漸入尾聲。

日本學者河原功指出，在 1916 年（大正 5）7 月號《中央公論》上所發表的《中央公論》，就日本的商業性綜合雜誌而言，可以說是第一部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的作品<sup>66</sup>。以《中央公論》的知名度來說，〈來自蕃地〉在當時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注目<sup>67</sup>。到目前為止，河原功的論文大概是探討中村古峽台灣相關作品唯一的一篇，在此前後並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關注。不過，河原功的論文並未提及中村古峽更早的創作〈到鵝鑾鼻〉。以兩份刊物的刊期來看，刊載〈來自蕃地〉的《中央公論》是每月發行，登出〈到鵝鑾鼻〉的《東京朝日新聞》則是日刊，〈到鵝鑾鼻〉甚至連載了 16 回。因此就閱讀人口而言，〈到鵝鑾鼻〉的能見度

<sup>65</sup> 中村古峽（筆名古峽生），〈鵝鑾鼻まで〉（直到鵝鑾鼻），《東京朝日新聞》，自 1913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5 日連載，共 16 回（6 月 21 日沒有連載）。在河原功的論文〈日本人の見た台湾原住民——中村古峽と佐藤春夫〉，並沒有討論這篇作品。

<sup>66</sup> 河原功，〈日本人の見た台湾原住民——中村古峽と佐藤春夫〉（日本人所見的台灣原住民——中村古峽與佐藤春夫），收入山口守編，《講座 台灣文學》，東京：國書刊行會，2003 年，頁 63。本篇論文探討了中村古峽的〈來自蕃地〉與佐藤春夫的〈霧社〉、〈魔鳥〉，主要圍繞在這兩位作家所呈現出來的原住民形象。

<sup>67</sup> 《中央公論》在明治時代創刊，經過大正、昭和、平成時期，是至今仍在發行的綜合月刊雜誌，發行者為「中央公論社」。

也不可小覷。檢視中村古峽的著作年表，他的台灣相關作品只有〈到鵝鑾鼻〉與〈來蕃番地〉而已，把這兩篇作品並置討論，應該可以更為周延地觀察中村古峽的台灣再現。本節的研究企圖，在於透過一位民間知識人的觀點，亦即中村古峽的台灣相關作品，去側面理解大正時期日本人的台灣印象。從而，藉由小說中所描述的牡丹社事件與日英博覽會，或許能夠重新認識日本作家如何透過各種事件去建構最初的殖民地想像。

## 二、國境之南：〈到鵝鑾鼻〉的殖民地風景

〈到鵝鑾鼻〉是記錄中村古峽在 1913 年（大正 2）到達台灣南部之後，從阿緱出發<sup>68</sup>，一路行至鵝鑾鼻燈塔的沿途見聞。鵝鑾鼻是台灣最南端的海角，地理景觀相當奇特，有怪石、巨礁及洞穴<sup>69</sup>，周圍則分佈有排灣族的原住民部落<sup>70</sup>。明清以來，鵝鑾鼻附近海域經常發生外國船隻與本地原住民的紛爭事件，關於外國人遇難的消息經常耳聞。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在外交壓力下，委託英國皇家學會技師畢齊禮(W. F. Spindey)興建鵝鑾鼻燈塔，於 1882 年（清光緒 8）完成<sup>71</sup>。日治時期以降，這座燈塔由最初的軍事、外交功能，逐漸成為台灣制度化旅遊的觀光景點。

對日本人而言，鵝鑾鼻燈塔的吸引力不僅止於其周邊天然海灣的壯闊景觀，更重要的是它做為國境極南的地標象徵。早在 1901 年（明治 34）的《日本名勝地誌・台灣編》，就對這座燈塔及其周邊做過介紹<sup>72</sup>，1916 年（大正 5）由總督府發行的《日本名勝舊蹟誌》也有列出。不過，由鐵路部所發行的觀光導覽《台灣鐵道名所案内》（1908）、《台灣鐵道案内》（1912）、《鐵道旅行案内》（1916）卻完全沒有提及鵝鑾鼻，直到 1921 年版（大正 10）的《鐵道旅行案内》，才簡略記述鵝鑾鼻燈塔的所在<sup>73</sup>。這是因為 1908 年（明治 41）開通的西部縱貫鐵路只建設到高雄，而一般私鐵的營造都和製糖會社的經濟效益有關，因此並沒有鐵路直達鵝鑾鼻。鵝鑾鼻實際成為觀光景點，要到 1920 年代後半；當時道路堪稱完備，

<sup>68</sup> 阿緱（現今的屏東）位於鳳山東方約 1568 公尺處，過淡水溪約 392 公尺的地方是廳治所在地。位居通往南部原住民山區的要塞，產米甚多，後來也發展製糖事業。

<sup>69</sup> 「鵝鑾」是排灣族語「帆」的譯音，因為附近的香蕉灣有類似帆船的石頭，加以該地形突如鼻子，故稱為「鵝鑾鼻」。

<sup>70</sup> 排灣族（Paiwan）以台灣南部為活動區域，分佈北起大武山地，南達恆春，西自隘寮，東到太麻里以南海岸。包括高雄縣市、屏東縣、台東縣境內。

<sup>71</sup> 在燈塔所在地設有鵝鑾鼻公園，鵝鑾鼻燈塔曾經是台灣最南端的標誌，後來被「台灣最南點」地標所取代。

<sup>72</sup> 島田定知，《日本名勝地誌・台灣編》，東京：博文館，1901 年。

<sup>73</sup> 曾山毅，《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都：青弓社，2004 年第 2 刷，頁 210-211。

已能提供小型汽車通行<sup>74</sup>。《台灣日日新報》曾在 1927 年 5 月推出「台灣八景」票選活動，翌年 8 月揭露票選結果，鵝鑾鼻成為八景之一<sup>75</sup>。透過此結果可以窺知，在 1920 年代末期，鵝鑾鼻燈塔的觀光形象已被公認，它的旅行條件也臻於成熟階段。

中村古峽在 1913 年來台灣，當時到鵝鑾鼻尚且是一項辛苦路途。雖然沒有資料可以查證他旅台的詳細行程，不過鵝鑾鼻顯然讓他印象深刻，也成為他的旅遊重點，甚至後來寫成〈到鵝鑾鼻〉，從他所留下的文字可看出端倪：

想走到鵝鑾鼻去看看這個念頭，是在東京下神戶的車上，初次讀到《台灣案內記》時就開始有的宿願。說到帝國最南端的海角，不知為什麼，我的好奇心被煽動著。但是那裡是個連地圖上看來也頗為偏僻的地方，想到以前幾乎全被劃為蕃地，又有某些不安的，那好奇心亦多少萎縮了。<sup>76</sup>

這是〈到鵝鑾鼻〉的開場白，透露出作者既期待又不安的旅情。一方面，中村古峽對於屏東——日本國境之南充滿無限憧憬；另一方面，他也對地圖上所顯示的陌生海角懷有忐忑情緒。在第一回的連載，中村古峽把他成行之前的錯綜心理，描寫得相當細膩。對於是否前往鵝鑾鼻，他一直猶豫未決，在和官方人士接觸後，因為阿猴廳長的推薦與承諾：「那邊很有趣哦，去是很好的，我們也會盡可能給予方便……」這番話，重燃了他的念頭。但是一想到沿途道路狀況不佳，可能必須藉助「轎子」這種光看就足以令人眩暈的「無聊東西」，立刻削弱了他的遊興。在抵達東港後，中村古峽為交通工具的問題再度徵詢他人意見，才發現前往鵝鑾鼻的路途並不如想像的險阻，儘管道路確實難行，但是如果在內地習慣徒步旅行的人，也絕對沒有走不到的路。這些訊息增強了他的信念，揣想縱使不坐在轎上被人搖晃扛著走，應該也能完成旅途吧。但是，中村古峽更需克服的，顯然還是心理問題。他聽聞鵝鑾鼻沿途和「蕃界」頗為接近，時常會有「蕃人」出沒，就算沒有親自遇上帶刀的「蕃人」，只要提起這種事就已經讓人心情不快。不過最後讓中村古峽下定決心，除了來自官方的善意，主因還是在於台灣原住民部落給予他的野性魅惑：

<sup>74</sup> 同上註，頁 211。

<sup>75</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2005 年，頁 375-377。1927 年 8 月 27 日公佈的台灣八景有台中州：八仙山、高雄州：鵝鑾鼻、花蓮港：太魯閣峽、台北州：淡水、高雄州：壽山、台南州阿里山、台中州日月潭、台北州：基隆旭岡。

<sup>76</sup> 這一段話是作者在〈鵝鑾鼻まで〉連載第一回（《東京朝日新聞》，1913 年 6 月 19 日）所寫下的內容，就放在文章的第一句。另外，關於中村古峽所提到的書《台灣案內記》，台灣的圖書館藏系統和日本的圖書館藏系統都無此書名，目前無法確知這本書的詳細資料。

然而，從佐藤廳長那裡已經取得幾封介紹信，也都向沿途的各支廳以電話通知了。而且好不容易來到台灣，只要踏入蕃地一次也好，想去體驗看看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經驗。我又被別的好奇心所強烈煽起，越發堅決進行鵝鑾鼻之旅。(第一回「生蕃袋與傘一把」, 6月19日)<sup>77</sup>

中村古峽實踐了他的願望，並且在當年返回日本後不久即發表〈到鵝鑾鼻〉，把該次旅行鉅細靡遺地記錄出來，這篇紀行自1913年6月19日到7月5日分成16回在《東京朝日新聞》連載，全文字數計三萬字左右，各回標題與景點如下：

連載日期	篇名	中譯	行經地點
6月19日	一、生蕃袋と傘一本	生蕃袋與傘一把	阿猴廳(屏東市)→東港
6月20日	二、夜中のトロ	半夜的台車	東港
6月22日	三、未明の枋寮	未明的枋寮	枋寮
6月23日	四、初めて見た蕃人	初次見到蕃人	枋寮→枋山
6月24日	五、見窄らしい蕃童學校(上)	破舊的蕃童學校(上)	枋山→圓山埔的蕃童學校
6月25日	六、見窄らしい蕃童學校(下)	破舊的蕃童學校(下)	圓山埔的蕃童學校
6月26日	七、生蕃よりも水牛	水牛比生蕃還.....	枋山→楓港→海口
6月27日	八、琉球藩民の墓	琉球藩民的墓	海口→統埔村
6月28日	九、四重溪の暮色	四重溪的暮色	四重溪→溫泉所在地
6月29日	十、石門の古戦跡	石門的古戰蹟	四重溪溫泉→石門
6月30日	十一、毒蛇毒草	毒蛇毒草	石門
7月1日	十二、恆春の城堡	恆春的城堡	恆春
7月2日	十三、墾丁の種畜場	墾丁的種畜場	大板轆→墾丁
7月3日	十四、龜仔角蕃の今昔(上)	龜仔角蕃之今昔(上)	龜仔角社(社頂)
7月4日	十五、龜仔角蕃の今昔(下)	龜仔角蕃之今昔(下)	龜仔角社(社頂)
7月5日	十六、東洋一の大燈臺	東洋第一大燈臺	鵝鑾鼻燈塔

透過文章的各回標題，可以大略勾勒出中村古峽的南行路線。作者從抵達阿猴開始記述，在歷經反覆思考後，他終於以篤定心情出發，旅行裝備相當輕便，隨身行李只有一個生蕃袋與一把傘。用細麻繩所編織出的生蕃袋，四角附有寬帶以掛背在身上，是當時「蕃人」外出必備的置物袋，稱之為「シカオ」(shikao)。有當地旅行經驗的人將這種袋子借給中村古峽，幫他省略了手提行李的麻煩。而

<sup>77</sup> 本文引用〈鵝鑾鼻まで〉之內容，僅在文字後註明連載回數、標題與日期。

他所攜帶的傘則權充手杖，可以遮雨也能助走。如此輕鬆的裝備，有一種灑脫的姿態，似乎也在暗示他決定成行後的心境。

可以說，〈到鵝鑾鼻〉的文字是頗為吸引人的，中村古峽透過生動、細膩的素描手法，再現自己的台灣體驗，以一種近距離觀察方式呈現台灣南部的風土人情，足以讓日本民間讀者群透過文字感受殖民地的南方氛圍。也由於他的旅行者身分，提供一個他者的視野以回顧 1910 年代屏東風情。例如在第二回與第三回當中，他詳細介紹了台灣交通名物「台車」，從東港到枋寮之間，他就是搭乘這種手推輕便台車（如下圖）<sup>78</sup>。



手推輕便台車是當時台灣庶民的日常交通工具，中村古峽以台灣的「名物」來介紹它。文章中一再出現的名詞「トロ」，是「トロッコ」的簡稱，來自英文「truck」，泛指在輕便軌道上以手推方式運行的小型貨車。日治初期，由於交通建設的經費有限，未能立即鋪設環島鐵路。但是因為農林礦業的開發，私人企業所築設的「輕便鐵道」乃大行其道。到了大正年間，幾乎台灣各地聚落都依靠這種軌道以人力台車聯結周邊的交通。只是這種輕便鐵道多以聚落為中心，向周圍山林與小村莊放射，彼此間缺乏縱向連繫<sup>79</sup>。中村古峽在文章中也透露，早在從台中要到霧峰林家拜訪時，就曾經坐過這種交通工具。這次再度搭乘，他對乘車方式已頗為熟悉，一上車立即能夠擺正坐姿。他顯然對台車留下深刻印象，因此

<sup>78</sup> 所謂輕便車其實是由木材所架成的簡易台車，底板係由木板拼起，板的四個角豎起四根木柱子，以作為搬扶之用，而底板上則放置了長型木箱，作為客人的座椅。台車底下安置和火車類似的車輪，行駛於鐵軌道上。這樣的輕便車並非由煤油蒸氣所帶動，也非靠牛馬牲畜來驅駛，而完全是由一位車伕一台車司機，透過手執木頭或竹截撐住地面或推或拉來使輕便車在鐵軌上前進。請參閱曾昭勳採訪、巫秀淇整理，〈輕輕便便輕便車〉，文字及圖片皆轉引自村村客家文化上網—人文觀察與田野紀錄，網址 <http://land.ihakka.net/groups>。

<sup>79</sup> 戴震宇，《台灣的鐵道》，新店市：遠足文化，2002年，頁9-10。

以兩回的篇幅描寫這次的台車體驗。作者的用意，也許是想記錄下殖民地的交通狀況與庶民生活。透過〈到鵝鑾鼻〉對於行程的詳盡描述，可以推想作者應該有隨身筆記的習慣<sup>80</sup>。

計畫搭車前往枋寮當天，車伕半夜三點就來叫醒中村古峽，他在簡單梳洗整理後，三點半從東港出發，不到六點就已抵達枋寮。這段行程，作者運用相當細膩的文字來形容屏東夜色。道路旁有許多相思樹，經過時垂下的樹枝輕撫著他的臉頰，令他想起日本內地的柳樹。路上還時常看到水牛的身影，真是令他驚奇，是連夜晚都被放養在草原上吧。而夜中疾駛在南方平野上的台車，猶如一幅動態的風景畫，無形中添增了一份特殊情調。當大地尚未天明，人們還在睡夢之際，台車所到之處，沒有受到任何阻礙，也不需要錯車等待。冬天的夜晚雖然有些微寒意，卻還是比下雪的日本溫暖許多，相較之下，作者覺得這裡真是一個極樂的旅行環境。美中不足的地方，大概是和車伕之間的溝通障礙。本來只約定僱一個車伕，出發時卻又多了一個人，在言語不通的狀況下，中村古峽暗想他們是為了貪圖兩份工資吧，之所以會有這種負面念頭，也是人之常情：

人在因為語言不通而缺乏意見溝通的情況下，總是會有懷疑對方的習性。(二、半夜的台車)

他反省了自己的想法，為這樣的習性感到愧疚，不過卻無法避免面對類似情況時的反射思考。身處異地，語言障礙所帶來的距離感是不難理解的。在行進當中，兩位車伕一直在聒噪對話，如果他遭遇的是一趟沉默旅程，旅情也許會有所不同。

當他們清晨抵達枋寮時，天尚未全亮，舉目所及完全看不見官廳的房舍，也沒有任何人影，大地才正在緩慢地甦醒當中。當看到這幕景象時，中村古峽湧起一種會被遺棄在這荒野的恐慌。從而他對枋寮的第一眼印象，顯然帶有心境的寫照：

土塊堆積而築的簡陋土人家屋，兩側排列著低矮屋頂，待在到處都尚是寂然與寂靜的此地，好像來到一個長久埋沒在地底而現在才漸漸被挖掘起來的廢墟的感覺。(三、未明的枋寮)

在 1910 年代，枋寮只是一個人口不到五百人、介於海濱一角的小村落。當天未明之際，沉靜的枋寮遂讓中村古峽油然而生一種廢墟之感。1899 年（明治

<sup>80</sup> 在第二回〈夜中のトロ〉（半夜的台車）中，中村古峽有提到被他放進生蕃袋的隨身物品：《南部台灣》一冊，地圖兩三張，睡衣一套，裝入牙籤、牙粉等用品皮包一個，筆記本，鉛筆，替換的領襟一條。

32) 中村古峽未滿 20 歲時，就從奈良前往東京發展。相對於東京的現代化速度，他大約能從台灣感受到一種遲緩的生活步調。就算是當時的島都台北，顯然無法和繁華的東京相比，就更遑論屏東、甚至是南部海邊的枋寮了。台灣南部的鄉鎮風景，從他的文字中透出幽闇的色澤，感覺有種沉重的氛圍。這樣的色調，也可以在第五回和第六回中所描寫的蕃童學校中看見。

抵達枋寮之後的行程，中村古峽開始以步行方式前進。從枋寮走到枋山的旅程，遇到一位會說日語的漢人少年和他同行。途中有原住民和他們錯身而過，少年告訴他，原住民是為了下山來交換物品的。這是中村古峽初次見到原住民，但並沒有近距離的接觸。在到達枋山後，透過官廳警吏的帶路，他拜訪圓山埔的「蕃童」學校，才和原住民有了正式的交流。藉由文章描述，可以推測中村古峽參觀的是一所「蕃人公學校」，而非「蕃童教育所」<sup>81</sup>。這兩者的教化功能都是相同的，然而「蕃童教育所」的特殊之處在於擔任撫育工作的老師，通常由駐防在教育所不遠的派出所日籍警察兼任，是針對山地部落兒童所設置的教育場所。學習國語（日本語）是原住民兒童教育的重點，並且讓兒童透過德育修身，對日本文化、現代技術懷抱崇敬之心，進而達到馴化原住民的作用<sup>82</sup>。

而中村古峽所參觀的學校，也不過是一間不到十坪的簡陋土屋，和平地的公學校相比，實在令人難以相信這是一個小學，而且學童數僅有十一位。中村古峽進入參觀後，看到更為破敗的景象：屋子裡面只擺設了幾張污穢的桌子，黑板後面的牆壁大半毀壞，天花板還破洞透光，當時有四、五個面貌黝黑的「蕃童」在上數學課。與年輕的日籍校長談話之後才知道，原來這間小屋本來是寄宿生的宿舍，因為前年夏天風災把校舍損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將宿舍充作教室使用，才會呈現如今難堪的景況。但是學校最早的面貌並非如此，在阿猴廳的行政區域裡共有三所蕃童小學，這所其實是最早創設的，剛開始成立時也有過風光的歷史，曾收容了近五十多名的學生。後來陸續有人逃學，在學校移轉到圓山埔之後，因為位置距離蕃社遙遠，退學者增加，遂漸變成現在的人數。

在中村古峽筆下，台灣漢人的房屋土間，帶有一種荒廢的歷史感，像是失落生命力的空間。但是南方的生物、植物，甚至是原住民小孩，則給予他生氣勃勃的感覺。這些學童身穿污穢的單薄衣物，腹部和臀部全坦露出來，肚子明顯突出，每個人都赤腳，頭髮則像河童造型一般剪齊。在中村古峽眼中，他們的裝扮外貌就像猴子穿上衣服。但是體格顯然是比平地的漢人優秀，圓渾的肩膀、帶著光芒的小眼睛，隨處可見有剽悍的氣勢。如果能夠善用撫育的方式，應該會教養

<sup>81</sup> 圓山埔的這所「蕃童」學校，設立於 1903 年（明治 33），後來改稱為「內獅頭蕃人公學校」。

<sup>82</sup> 許雅妮，〈日治時代初期（1895-1930）における台湾原住民教育—「蕃童教育所」の役割〉（日治時代初期（1895-1930）原住民教育—「蕃童教育所」の役割），《台灣原住民研究》，第 10 号，2006 年 3 月，頁 42。

成為比漢人更加忠厚且伶俐的人。中村古峽在教室中，對學童有了近距離的觀察。當學童們彼此使用排灣族母語交談時，和漢人殺風景般的語言相比，猶如音樂一般在耳邊響起。而且學童的日語朗誦，也讓中村古峽印象深刻：

那個男生是四個蕃童中肚子最胖的小孩。他朗讀的文章，記得大概是描述富士山的文章，日本語的音調頗為不錯，與至今為止在平地的公學校裡所聽來的土人學童的發音比較之下是非常好的。我近來偶爾會思索，就人種與語言系統之上來說，台灣的蕃人比起土人，不是和我們日本人更接近嗎？進入蕃地之後愈加確定了這個想法。（六、破舊的蕃童學校（下））

透過作者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他對原住民學童的好感，也對漢人稍稍顯露了負面的印象。在此同時，他強調教化的力量，這群小孩只要接受教育，應該能讓他們擺脫野性，甚至成為優於漢人的人種。中村古峽對於原住民的看法，是來自個人的思考，或是受到殖民者論述的影響？在文章中他並未提及。不過，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在 1913 年（大正 2）發佈「蕃童教育意見書」，卻和中村古峽的意見有相當程度的契合。意見書指出，由於台灣人和日本人是不同的民族，分別持有各自的歷史之故，要急速同化台灣人是難上加難的。但是在台灣原住民方面，隨著教育的實行之成為純粹的日本人則絕非難事，這也是原住民教育的根本要旨<sup>83</sup>。顯而易見，殖民者認為這些未脫「野蠻性」的人種是沒有歷史文化的族群，就像是一張白紙，因此他們的可塑性很高，只要將日本文化的因素植入他們的思維之中，自然就能撫育出馴服的人民。中村古峽來台灣後，和官方人士有頗多接觸。雖然他不具官方身分，但是從文章中可以得知，他在進入「蕃地」前後，沿途受到各地官廳的招待與嚮導，不難推測他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某種程度上有可能受到這些人物的影響。這或許能說明，他在原住民兒童的看法上，為何和「蕃童教育意見書」頗為一致。而他對漢人語言的隔閡感，從他面對台車車伕的態度可以窺探。從東港到枋寮的路途，因為車夫不懂日文，中村古峽和兩位車伕有極大的溝通障礙，這種情況也讓他對旅程有些許不安。然而當他逐漸進入「蕃地」，沿途碰到的原住民竟然以日語：「日安」（こんにちは）向他問好：

向巡查詢問他們是何處的蕃人，答覆說是牡丹社的。頭上包覆著豬的毛皮，胸前垂下珊瑚玉的裝飾，以前讓琉球藩民驚訝的耳朵如今依然

<sup>83</sup> 許雅妮，〈日治時代初期（1895-1930）における台湾原住民教育—「蕃童教育所」の役割〉（日治時代初期（1895-1930）原住民教育—「蕃童教育所」的角色），《台灣原住民研究》，第 10 号，2006 年 3 月，頁 48。

還炭入著木片和貝殼。感覺在他們的親族當中，也有割取琉球人人頭的吧，也有在七年的戰役中被征伐的人吧。(九、四重溪的暮色)<sup>84</sup>

曾經震撼日本的牡丹社事件，是開啟日本民間對於台灣原住民印象的重要關鍵。然而這些原住民的親族後代，現在卻能以日文禮貌地向他問好。姑且不論他們的日文程度如何，這段內容顯示，殖民化／文明化的力量，是足夠改造「野蠻性」的。作者對於牡丹社事件表現強烈的興趣，在〈到鵝鑾鼻〉的後半部分，幾乎都在介紹牡丹社事件的遺蹟。第八回的「琉球藩民之墓」，是描述作者到統埔去參觀在牡丹社事件後日軍為紀念在該事件中被殺死的琉球人所建造的墓。第十回的「石門的古戰跡」，則是作者到達石門古戰場，緬懷 1974 年日軍進抵石門後和台灣原住民展開激烈戰役的歷史。第十二回的「恆春的城堡」，記述清朝在牡丹社事件之後基於海防需求，聽從了欽差大臣沈葆楨的建議而築城，作者一邊遊歷恆春古城，一邊又回憶起種種歷史。第十五回「龜仔角蕃之今昔(下)」，作者已行至鵝鑾鼻燈塔所在地附近，整回文字說明燈塔的歷史；由於鵝鑾鼻附近海域經常發生外國船隻與原住民的紛爭，在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迫於外交壓力，終於委託英國技師畢齊禮(W. F. Spindey)興建鵝鑾鼻燈塔。〈到鵝鑾鼻〉不僅記錄了台灣南端的絕景，也圍繞在是鵝鑾鼻燈塔和牡丹社事件之上。就內容而言，其實不難看出作者亟欲以客觀的方式再現。中村古峽似乎想藉由這篇紀行，將牡丹社事件的歷史始末，再次介紹給讀者<sup>85</sup>。

由於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引起清廷對台灣的重視，轉為積極治理台灣，增設府縣，並在 1885 年建省。這個事件也可算是日本開始發展帝國主義的徵兆，不論是否發生琉球藩民遇難事件，日本都會處理琉球王國之間的關係，將其編入新國家體制之內<sup>86</sup>。在 1871 年琉球藩民遇難事件的發生，剛好提供日本一個出兵的契機，同時解決了內政與外交問題。另一方面，對民間的日本人來說，他們透過這個事件認識了台灣，而且對「蕃人」的獵頭習俗留下鮮明深刻的印象。這也

<sup>84</sup> 文中所提到的年代：「也有在七年的戰役中被征伐的吧」，是指 1874 年（慶應 7）。

<sup>85</sup> 牡丹社事件起因於 1871 年，有一艘琉球宮古島船隻在海上遭遇颶風，船上 69 人中有 3 人溺斃，後來漂流到台灣的屏東縣滿州鄉附近，船上的琉球人上岸後因不諳當地民情而誤闖原住民部落，導致有 54 人遭到殺害。幸運生還的 12 人，在漢人的幫助下平安返回琉球。琉球的歸屬問題在 17 世紀初尚處於「中日（薩）兩屬」狀態。明治維新之後，大量武士失業，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於是國內出現「征韓論」，企圖以海外擴張來解決內政問題。但是征韓在外交上困難較大，所以未獲得內閣多數閣員支持。後來日本政府為了安撫士族情緒，以牡丹社事件為契機，遂有出兵台灣之議。當時日本當局藉口保護琉球居民，在 1874 年出兵台灣攻打「蕃地」。日軍 5 月在社寮登陸後，隨後與牡丹社人在石門爆發戰役。6 月初再度動員兵力攻入牡丹社，終於迫使該社投降。軍事勝利後，日本向清朝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兩方後來簽訂條約，承認日本出兵討伐番地的正當性，並且賠償日本軍事費用，日軍遂於 12 月撤軍台灣。由於該事件的發生，引起清朝對台灣的重視。

<sup>86</sup> 毛利敏彥，《台灣出兵：大日本帝国の開幕劇》，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6 年 7 月，頁 18。

說明中村古峽在面對牡丹社的原住民時，為何內心會出現那樣的想法。

在重溫歷史之外，〈到鵝鑾鼻〉所描寫的台灣風土，誠然對日本讀者而言，也帶有強烈的異國情調，例如他在描寫台灣水牛的部分，應該會攜來新奇的想像。早在半夜搭乘台車之際，他已經見識到在深夜的平原上，仍有許多牛隻被放養在野外。在枋山往恆春的山林中，再度出現令他更不可思議的景象：「驚奇的是，在碰不到任何人的山中，水牛被到處放飼著。」這些水牛，搖動著二尺長的大角，十數頭成群而行，常常堵住前方的小徑。當牠們從人身邊經過，每隻牛都齊向人這邊睥睨，這也被稱為「水牛的最敬禮」。中村古峽的觀察中，台灣水牛的脾性相當奇怪：

一般而言這種動物性情乖僻之處在於對小孩特別溫順。還不到七、八歲的土人囡仔，握著相思樹枝為鞭，啪擦啪擦地擊打相當於自己身體二三十倍的傢伙的屁股，水牛卻唯命是從，這種地方是旅行台灣的人都目擊的。可是對於大人，卻顯露出動不動就反抗的態度。特別是對內地人好像持有很深的敵愾心。例如一旦行過最敬禮後，突然從後方頂過來這樣。領台以來，同胞遭遇此受害者絕不在少數。其中也有知名人士因此而斃命者。「尤其在恆春的山野盛行水牛放牧，所以從此開始往南方的旅行，水牛反而比起生蕃更請您注意。」這句今早在枋寮聽到的話，又重新浮上我的心中（七、水牛比生蕃還……）。

透過中村古峽的形容，台灣的水牛對小孩特別溫馴，卻對成年人顯露反抗姿態。其中「特別是對內地人好像持有很深的敵愾心」，讓他面對頗為水牛時頗有危機意識。然而，中村古峽筆下的水牛，並非台灣人所熟悉的；水牛是台灣人印象中的溫馴動物，不但是農村主要的勞動力，也象徵著刻苦耐勞的精神。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作品中，水牛多半是點綴作品的鄉村風景之一，楊逵的〈水牛〉，雖以水牛為標題，卻是描寫一位少女的不幸遭遇<sup>87</sup>。不過在美術創作方面，倒是有不少以水牛為主題。最為著名的，大概是屬雕塑家黃土水的〈水牛群像〉<sup>88</sup>，這個作品生動刻劃出牧童與水牛之間的互動。放牧牛隻的工作會由兒童來擔任，顯然是取決於水牛的柔順個性。這兩者之間的結合，在中國繪畫中已有許多例子

<sup>87</sup> 楊逵，〈水牛〉，《台灣新文學》，創刊號，1936年（昭和11）1月。

<sup>88</sup> 黃土水（1895-1930）是日治時期著名的雕塑家，1920年（大正9），他的雕塑作品〈蕃童〉，入選日本帝展，為台灣人第一位入選的藝術家。〈水牛群像〉是黃土水的著名作品之一，完成於1930年（昭和5），這座浮雕寬555公分，高250公分，是他逝世前所創作的，目前收藏於台北市的中山堂。〈水牛群像〉的作品內容是以芭蕉樹為背景，刻劃牧童與水牛之間的互動，其中一個牧童是騎坐在牛背上，手裡拿著竹枝。另一名則是雙手溫柔撫摸牛頭，水牛低頭的姿態相當溫順，整部作品感覺和諧而恬適。

可循。而台灣畫家林玉山的作品〈歸途〉<sup>89</sup>，則描繪出一位農婦與水牛的和諧情調，膠彩的質感與中國水墨畫大異其趣，台灣鄉土色彩在此表露無遺。這幅畫也釋出一個訊息；農民和水牛之間的情感，是生活夥伴的依賴關係。

因此，中村古峽所描述的水牛形象，對台灣人來說應該是陌生的。不過，以一位外地旅行者的立場，他的戒慎恐懼是可以理解的。水牛的體型巨大，頭上的一對大角確實駭人，也許有傷人事件發生，卻不足以影響台灣人對牠們的態度。站在台灣人的立場，這些水牛或許是性情頑固的傢伙，卻有其老實之處。這也是中村古峽在意的地方，比起外型，他更著重於描繪水牛個性的乖僻。從他聽來的傳聞，台灣的水牛似乎對日本人抱有敵意。水牛果真能分辨出台灣人或日本人？這一點值得懷疑。在堅毅固執的特質上，台灣的水牛和農民是頗為相似的，或許是把水牛的韌性聯想為台灣人對殖民者的反抗意識，才會出現那些說法。作者在台灣水牛的觀察上，有可能是一種偏見，但是也展現了異於台灣人的另類視角。坦白說，中村古峽的文章，其實是饒有趣味的，他的描寫富於生動、裕於自然，很能掌握事物的特徵，提供一個民間立場的台灣書寫紀錄。這對於理解大正時代日本人的台灣認識，無疑是有歷史價值的。

相較於水牛，「生蕃、瘧疾、毒蛇」這三樣名物，更是一般日本人對於台灣的刻板印象，〈到鵝鑾鼻〉還是可以發現這些思維。在介紹台灣的原住民、水牛之餘，中村古峽也分別談到瘧疾與毒蛇。在第十回的「石門的古戰跡」，作者除了陳述日軍在石門和台灣原住民展開激戰的過程，也提及今日方士氣大為折損的「台灣熱」。當時日本醫官所謂的「台灣熱」，即是瘧疾。瘧疾主要的流行地區為非洲中部、南亞、東南亞以及南美北部的熱帶地區，因此並非台灣地區的特有疾病。被稱為「台灣熱」，顯然是肇始於日本人在台灣得到瘧疾的經驗。當時從軍的3658人當中，戰死僅有12人，病死卻都多達561人。瘧疾成為征台役官兵的極體災難，根據中村古峽的形容，由於生病人數太多，抗瘧藥品奎寧完全不敷使用，甚至出現有病兵盜用的情況，可以想見軍心惶恐的景象。台灣被視為瘴癘之地，在清朝許多文獻中已可發現。直到日本人殖民統治之後，台灣才逐漸展開公共衛生建設，進而控制各種疫情的肆虐。但是對一般內地的日本人而言，從征台役到領台初期的疾病肆虐，「台灣熱」被賦予的疾病隱喻還是存在的，它代表了殖民地與日本文明化之間的反面關係：原始、落後、污穢。這也是日籍作家在台灣書寫上的一種描景傾向，因為多半是旅行者身分的觀察視角，台灣色的特徵事物自然成為被選擇材料。

<sup>89</sup> 林玉山（1907-2004），是日治時期著名的畫家，1927年（昭和2）入選第一屆台灣美術展覽會東洋畫部，與郭雪湖、陳進並稱為「台展三少年」。他的畫作〈歸途〉，創作於1944年（昭和19），呈現了人與牛之間的和諧感。畫作內容為一位台灣農婦於工作結束後，牽著一頭水牛踏上歸途，牛背上背負著一捆甘蔗尾。整幅作品呈現出和諧、悠揚的情調。

在第十一回的「毒蛇毒草」，也記錄了作者在台灣旅行中印象深刻的爬蟲與植物；在爬蟲類方面是毒蛇、山蝨、壁虎，植物類方面則有咬人狗與咬人貓。令中村古峽最在意的爬蟲類，毫無疑問是台灣的毒蛇。當時有許多關於毒蛇傷人致命的新聞，尤其恆春地方亦多毒蛇。而山蝨也是令人不快的爬蟲類，行走在山林草叢中，似乎無法避免碰到這種噁心的東西。至於壁虎，雖然被視為益蟲，但是中村古峽提到，在台灣四處的家屋內，天花板上都可見壁虎的行蹤，有時還會掉落下來，因此日本人連冬天都必須掛蚊帳睡覺。不過他說：「這種蟲的鳴叫聲非常優美。」這是頗有趣的觀察。另外在植物方面，他也有生動描寫。其中提到某位警廳的高層人士來山地視察旅行時，途中臨時在野地如廁，因為不識咬人狗是一種有毒植物，而將它摘下充當衛生紙，後來下體癢痛不已卻有苦難言。這段文字其實很短，但是卻把一個日本官吏的尷尬窘境鮮明地勾勒出來，也藉此傳達熱帶植物的樣貌。不難發現，在中村古峽筆下的各種台灣生物，都充滿生氣勃然的意象，也散發強烈的野性氣息。這一點特徵亦出現在原住民書寫之中，映照他文章開頭的漢人書寫，足以形成強烈的明暗對比。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他對台灣原住民的接納程度較高，但其中也可能包含了他對野性美的複雜思維。

〈到鵝鑾鼻〉呈現了多樣的南國風情，可以想像此行視野見聞是多采多姿。但是這趟旅程絕非快適之旅，幾乎所有的行程都必須依靠腳力，這也讓中村古峽吃足了苦頭。長途跋涉的結果造成腳力不堪負荷，腳底起了很多水泡，更讓旅程亦加艱辛。儘管絕景當前，但是能夠撫慰心靈、療癒肉體的痛楚，除了溫泉別無所求。作者後來也在四重溪溫泉享受了泡湯樂趣<sup>90</sup>，稍稍提振了他的身心，支撐他再度前進的動力。這一切的努力，都將在看到鵝鑾鼻燈塔時獲得回報吧。矗立在帝國極南海角的燈塔，不僅指引海上船隻的方向，也擔負護衛國防的重任。在最後一回「東洋第一大燈臺」，他鉅細靡遺形容了進入燈塔內部參觀的過程。建造於清朝時代的鵝鑾鼻燈塔，在改朝換代後依然占據極重要的戰略位置，它也是帝國南端的象徵。對中村古峽而言，長途跋涉至此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單純觀光的目的，更帶有一種完成某種使命的感覺。他在〈到鵝鑾鼻〉的最後，甚至留下一段文字，說明這段旅程的後續發展：

我在此歸途更往恆春半島的東海岸走去，從蚊蟀再度進入山中，拜訪了高士佛、牡丹、草埔後、內文、率芒各蕃社，所謂恆春的蕃地幾乎

<sup>90</sup> 四重溪屬沉積岩分佈區，因有天然溫泉自地下湧出，古稱「出湯」。日治時期才逐步開發四重溪溫泉，1898年（明治31），恆春廳長柳木通義為開發四重溪，設置警察派出所、浴場之後，始有發展雛形。到了1930年代以降，四重溪溫泉已名列台灣四大溫泉之一，和草山溫泉、關子嶺溫泉、礁溪溫泉齊名。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溫泉的開發，可參閱曾山毅，《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ウリズム》（殖民地台灣與近代觀光旅行），東京都：青弓社，2004年第2刷，頁196-199。

全部踏破，但是將其寫下會過長之故，先在此擱筆。

透過這段文字可以得知，作者有意繼續把東部的行程也記錄下來，但是直到三年後的 1916 年，他才發表了〈來自蕃地〉，是一部以小說姿態現身的作品。〈來自蕃地〉也是取材自作者的台灣原住民部落旅行經歷，並以寫實技法呈現，但是仍與〈到鵝鑾鼻〉的紀行體裁有所差異。日本內地作家親自踏上殖民地，以台灣體驗所完成的紀行文學，大抵就屬佐藤春夫的《霧社》是既為人周知又優秀的散文佳作<sup>91</sup>。早於《霧社》發表的〈到鵝鑾鼻〉，則是一篇沒沒無聞的作品，然而它不僅具備散文的素樸美感，也以內地作家的角度提供讀者瞭解 1910 年代的台灣南國風貌。誠然，〈到鵝鑾鼻〉有許多觀看台灣的角度可能出現了偏見，顯露出作者的文明者位置，但是卻無損它的文學與歷史價值。以中村古峽的文筆，如果他沒有轉向心力投入心理學，而畢生持續文學創作的經營，也許這篇紀行會引起矚目的。

### 三、〈來自蕃地〉的文明信息

1916 年的〈來自蕃地〉，是一篇紀行文體的小說，也是作者根據 1913 年的旅台經歷所寫成。到目前為止，在 2003 年日本學者河原功的論文〈日本人所見的台灣原住民——中村古峽與佐藤春夫〉，是探討中村古峽台灣相關作品的唯一研究<sup>92</sup>，在此前後並沒有引起其他研究者的關注。不過這篇論作只討論了〈來自蕃地〉，並未提到中村古峽更早的創作〈到鵝鑾鼻〉。河原功的論點指出，在 1916 年（大正 5）7 月號《中央公論》上所發表的〈來自蕃地〉，就日本商業性綜合雜誌而言，可說是第一部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的作品。據筆者調查，該期雜誌是臨時增刊的特別號，專題為「世界大觀號」，內容選輯九篇以書寫各國「異國情調」為主的文學創作，分別是：有島生馬的小說〈孤鸞鏡中影〉（中國）、高濱虛子的小說〈從內地的海邊來〉（朝鮮）、小山內薰的小說〈莫斯科的第一夜〉（俄國）、與謝野晶子的小說〈拉典區之夜〉（法國）、坪內士林的劇本〈日本俱樂部〉（英國）、中村吉藏的劇本〈帽子別針〉（美國）、生田葵山的小說

<sup>91</sup> 關於日本作家在領台初期到中期以台灣為取材對象的寫生作品，島田謹二在〈台灣に取材せる写生文作家〉（取材於台灣的寫生文作家）有詳細介紹，收入《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 年，頁 39-64。

<sup>92</sup> 河原功，〈日本人の見た台湾原住民——中村古峽と佐藤春夫〉（日本人所見的台灣原住民——中村古峽與佐藤春夫），收入山口守編，《講座 台湾文学》，東京：国書刊行会，2003 年，頁 63。本篇論文探討了中村古峽的〈來自蕃地〉與佐藤春夫的〈霧社〉、〈魔鳥〉，主要圍繞在這兩位作家所呈現出來的原住民形象。

〈生鏽的鑰匙〉（德國）、中村古峽的小說〈來自蕃地〉（台灣）、長田幹彥的小說〈積丹的少女〉（愛奴）<sup>93</sup>。其中描寫到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旅行的〈來自蕃地〉，是標榜以「台灣」為創作背景的作品。雜誌內的卷頭語，指出了製作這一期「世界大觀號」的旨趣：

每年七月十五日所發行的『中央公論』臨時增刊加倍號，專門補捉愷切時勢之問題，內容皆是成自一流名家之筆的雄編大作……。諸如大前年的『婦人問題號』、前年的『新腳本號』、去年的『大正新機運號』，都掌握到當時的熱門問題。而如今適逢歐洲的大戰、中國的混亂、美墨的糾葛等等，處在世界大變動的當中，發行「世界大觀號」以研究世界的現狀，一方面能夠策畫日本帝國的擴大發展，另一方面對於世界是日本民族期望能夠完成的天職使命……。附錄的小說腳本九篇，是和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帝國以及以日本的新領土為背景而發揮異國情調最具珍奇趣味的創作，可以說是稍稍對厭棄平凡老套的文壇所投下的一帖清涼劑。敬請刮目期待本號的出刊日。

這一段話，透露了日本媒體對於新興日本帝國的奧援姿態，也亟欲展現其洞悉世界局勢的敏銳眼光。該期雜誌的社論〈論述日本在世界的地位〉，意旨是一目瞭然，其它並置的文章也多以時事評論為主，主要探討世界局勢與日本未來發展的關係。而「世界大觀號」的製作，顯然是當期的賣點，藉由小說或劇本的形式，開啟一扇讓日本讀者窺探世界的觀景窗。強調以「異國情調」為主題的選輯取向，透過中國、朝鮮、愛奴、台灣、俄國、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地為故事背景的文學創作，展示不同風情的異國樣貌。這些作品的來源，由雜誌出面邀稿的可能性居多。從而，藉由這樣一座窗口所看到的世界風景，顯然牽涉了取景者的觀看角度。以內容來說，「是和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帝國以及以日本的新領土為背景而發揮異國情調最具珍奇趣味的創作」，這樣的專題設計，以及目錄所呈現的整齊內容來看，編輯在邀稿之初極有可能提示了作者創作的方向，這也成為解讀〈來自蕃地〉的一個方式。

〈來自蕃地〉是一部約兩萬字的作品，全文分成五大段落<sup>94</sup>。故事的進行，

<sup>93</sup> 固定在月初發行的《中央公論》，在每年的7月15日都會出版臨時增刊特大號。在，1916年（大正5）7月所製作的「世界大觀號」上，共收錄入了9篇著作，分別是：有島生馬的小說〈孤鸞鏡中影〉（支那）、高濱虛子的小說〈內地の海邊より〉（朝鮮）、小山內薰的小說〈モスクワの第一夜〉（露國）、與謝野晶子的小說〈拉典區の夜〉（佛國）、坪內士林的劇本〈日本俱樂部〉（英國）、中村吉藏的劇本〈帽留針〉（米國）、生田葵山的小說〈錆びし鍵〉（獨逸）、中村古峽的小說〈蕃地から〉（台灣）、長田幹彥的小說〈積丹の少女〉（アイヌ）。

<sup>94</sup> 中村古峽，〈來自蕃地〉，《中央公論》，1916年（大正5）7月號，頁209-235。全文分為五

是主角以寫信的方式向日本友人 k 君描述自己到台灣「蕃地」的旅行過程。雖然這篇小說以「信件」的形式展開，表現手法還要採取紀錄旅遊行程、體驗為主的紀行文體。但是它並不像〈到鵝鑾鼻〉用回目的方式介紹各地見聞為敘述主軸，而是聚焦在幾個原住民事件來架構小說的發展。在旅途一開始，主角停留於日本人尚有強烈印象的「牡丹社事件」所在地，「一、來自蕃地的第一封信」以書信開啟情節，向友人描述自己前往「蕃地」的緣由：

k 君：

終於進入蕃地了。在內地時，只聞其名就多少有些令人不快的蕃地，我終於進來了。「為了什麼？」一類的，不要問這種事啦。只不過是像我往常一樣，一時任性的好奇心而已。現在我趴在月桃草所編織的粗糙草蓆上寫這封信給你的地方，是在我國歷史上夙有剽悍之名的「高士佛蕃社」——即使這樣說你也是一點都無法推測的，是在明治 7 年的征台役中和牡丹社協力合作、頑強抵抗我軍的高士佛蕃社的公學校的一角。（頁 209-210）

其實在 1871 年琉球人所闖入的正是高士佛社，後來因為文化認知不同而被該社的原住民殺害。之所以會稱為「牡丹社事件」，可能是因為琉球人並不熟悉恆春地方的原住民部落，也和石門戰役中的主力是牡丹社人有關<sup>95</sup>。文中所提到的征台戰役，發生地點就是中村古峽在〈到鵝鑾鼻〉所提過的石門。小說中的主角以一種重大事件的口吻來向友人描述自己的所在地，是冒險和獵奇的心態居多吧。當時的日本人對於異文化抱持著各種想法，他們的「野蠻人」觀，有過度夢想化的傾向，相反的也會產生蔑視。牡丹社事件發生之後，日本的新聞媒體頻繁報導這個事件的始末，將台灣原住民形容為和南洋群島食人族一般的野蠻人，這些內容取向了日本人的台灣認識。經由報導的文字，台灣的住民被賦予「野蠻」、「食人」等概括的觀念。在地理上，「南洋」的「未開化」也成為日本人形塑南方的意象<sup>96</sup>。在〈到鵝鑾鼻〉出現的「蕃童」，具有純真無垢的兒童形象，縱使他們是野蠻一族的後代，作者卻相信可以透過教化的力量去逐漸改造他們。然而〈來自蕃地〉所傳達出來的訊息，則是充滿文明與野性的衝突對立。

---

個段落，分別是「一、蕃地からの第一信」（來自蕃地的第一封信）、「二、テボ・サドガイと其の口風琴」（提波・沙豆蓋和他的口風琴）、「三、草埔後の一夜」（草埔後的一夜）、「四、恐ろしき一時間」（可怕的一小時）、「五、頭目の家の寶物」（頭目家的寶物）。

<sup>95</sup> 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台北：博揚文化，2006 年，頁 26-27。

<sup>96</sup> 山路勝彦，《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蠻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4 年 1 月第一刷，頁 32-35。

故事的第二部分「提波·沙豆蓋和他的口風琴」可說是小說中的一段高潮，主角在到達蚊蟀（今滿州鄉）後投宿在一所官廳房舍，透過一位公學校長 I 君的引介，認識了曾經於 1910 年（明治 43）被送到日英博覽會上做為人種展示的一位原住民男性提波·沙豆蓋：「這個男人是一位年紀四十左右，身長不高、圓臉、鼻子扁，而且始終露出污穢牙齒的蕃人。」（頁 217）沙豆蓋的父親在 1874 年（明治 7）日本的征台戰役中，很快就歸順了日軍，並且提供許多情報給日方，後來獲得日方的授旗榮譽。這面旗子隨之傳給了沙豆蓋，並且每天被他小心地隨身攜帶。提波·沙豆蓋是一位演奏口風琴的能手，他在傳統技藝的表現儘管精彩，但是 1910 年的異國經歷更讓主角動容。I 君告訴主角：「這個傢伙不喝酒就什麼也不說」（頁 217），所以頻頻向沙豆蓋勸酒，想要引起他的談話興趣。在喝了無數杯的酒之後，沙豆蓋的臉頰漸漸變紅，也開始多話了。由於沙豆蓋不會日文，透過 I 君的翻譯，主角聆聽了沙豆蓋的遊歷過程：先從基隆乘船到門司，然後再換船行經上海、香港、新加坡、孟買、可倫坡、蘇伊士、馬賽等地，最後抵達英國。在提波·沙豆蓋的描述之下，英國被形容成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到處都充滿了新奇的事物，尤其是各種現代化建設：

「滯英中，他們對什麼最驚訝？」我重複向 I 君提問，I 君立刻傳達給提波·沙豆蓋。面對這個問題，他邊用動作加手勢，熱烈地高談闊論了半小時。當然我對蕃語是一竅不通，所以無法描寫他的語氣是很遺憾的。他對於市街和家屋都寬大整齊而豪華感到驚訝，再來是驚奇於很少看到田地卻有很多的蜜柑和蔬菜。還有，每個英國婦人的腰都出乎意料的細，卻能夠站立走路真是奇怪。而在黑漆漆的地方一直往前奔馳，甚麼時候又從城市的當中出來了。警察的身材巨大也很嚇人。探照燈的眩人亮光讓人吃了一驚。最驚訝的是，有一天在博覽會場內的廣場上，好像有東西要爆炸的吧嗒吧嗒聲，甚麼事呢？一看之下，是大箱子般的東西在天空飛舞。看著看著，它升高像小鳥飛走般的變小了，後來也不見了。箱子的裡面坐了兩個人，我想大概死掉了吧——他這樣說。想來好像是看到飛行機了。（頁 218-219）

提波·沙豆蓋以極為興奮的口吻述說英國見聞，包括當地街道房舍的規模、果菜生產的豐饒、英國女人的纖細身材、倫敦地鐵的神奇構造，還有警察體形的壯碩，以及都會炫目的燈光。除了飛行機的描述是博覽會的展示內容，他所提到的場景都和英國的城市生活有關。做為被陳列展示的活人種，提波·沙豆蓋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參展功能。當主角問他會想念台灣嗎？他回答在展覽期間

根本沒想過台灣的事，反而希望妻子能到英國和他一起居住。在主角眼中，提波·沙豆蓋是一個思想單純的「蕃人」，縱使他具有特殊的英國經驗，卻和文明擦身而過。做為歸順日本的原住民後代，這是他會被選中參展的契機吧。或許提波·沙豆蓋是一位勇於嘗試新事物的人，所以他滯留英國期間才會樂不思蜀，然而半年的文明洗禮，卻無法徹底改造他的文化履歷。對博覽會的參觀群眾而言，原住民的人種展示，不僅具有探索異文化的知識意義，也正是區別文明與落後的證明方式，背後更有帝國主義的展示手段。台灣原住民與日英博覽會的結合，造成強烈的文化衝擊感。透過小說的行文，可以看出作者是以搜索奇聞軼事的心態來傳達這場對談的畫面。一個文化未開的原住民，能渡海重洋到英國居留半年，而且是以博覽會的活人種展示為工作，難怪日本人也覺得相當驚奇。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新興帝國日本的各種展示不僅是文明化的宣傳，更積極朝向凸顯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落差。日清與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獲取殖民地也得到發展帝國主義的機會，不論是國內的勸業博覽會或者海外的萬國博覽會，日本的積極運作都有定位日本作為「帝國」和「未開」殖民地的距離<sup>97</sup>。關於 1910 年所舉辦的日英博覽會，其實是為了緩和英美民間對日本日益深化的惡感所促成的<sup>98</sup>。而博覽會中的殖民地人種展示，就像是作為帝國的一種儀式與祭典，是帝國宣傳統治技術最好的方式。透過展示的手段，不僅能夠凸顯殖民母國的文明教化，也能彰顯殖民地對母國的經濟效益，更是帝國與帝國之間的較勁。追溯首度出現人種展示的博覽會，是 1867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中的中國巨人與侏儒。其後截至 1986 年為止，在 57 次的萬國博覽會當中，共有 67 處殖民地的人民被動員放置在博覽會中供人觀賞<sup>99</sup>。

殖民主義式的民族展示，在 1910 年的日英博覽會之前，日本已先在國內的勸業博覽會中模仿巴黎萬國博覽會而舉辦。1903 年（明治 36）在大阪舉辦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會場製作了一間供人參觀的「人類館」，預定將愛奴民族、台灣原住民、琉球人、朝鮮人、中國人等民族，當作「陳列品」來集結展覽。另外，還將愛奴民族、台灣原住民、琉球人共十數人的照片，以明信片的方式販售

<sup>97</sup> 吉見俊哉，《博覽会の政治学》，東京：中央公論社，1999 年 5 月 4 版，頁 214。

<sup>98</sup> 日本在日俄戰爭（1904-1905）中獲得勝利，在歐美的外交地位驟升，但是日俄戰爭後日本勢力進入中國東三省，與英美同時競爭東三省鐵路的興建與經營權，使英美民間對於日本的惡感日益加深。而且從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的外債持續增加，對英美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從財政外交與貿易的角度來看，日本認為此時和英國合辦一場博覽會，或許可以化解英國對於日本的負面印象，亦可增加對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投資，並順利取得英國的借款。基於這些考量，於是促成 1910 年日英博覽會的舉行。請參閱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170-171。

<sup>99</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115。

<sup>100</sup>。這場人種展覽，引起了中國、朝鮮、琉球方面的強烈抗議，被稱之為「人類館」事件，後來日本在展覽前取消了中國方面的展示，朝鮮與琉球則在展期中次第中止。<sup>101</sup>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他們所提出的嚴重聲明，都在抨擊日本將他們與「未開人種」並列展示。這裡所謂的「未開人種」，無疑是指愛奴民族和台灣原住民。可見北海道的愛奴民族和台灣的原住民，在「人類館」事件當中是居於最弱勢的位置。誠然，本文的重點並非討論愛奴人的問題<sup>102</sup>，在此提出是為了說明，日本在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發展上，如何運用人類學的展示方式來達成其目的。雖然歷經了「人類館」事件的衝擊，人種展示在此後仍然持續進行。

1910 年日英博覽會的人種展示，就是一個最好的後例。這次的展覽在倫敦舉行，會場分為三大部分，靠近主門的第一區是英日兩國的各主題館，如染織、工藝、歷史、自然風土等館，而介紹日本在台灣統治狀況的「第 17 號展場」則位於第一區的最後面（即第 23 號館：東洋館）內。第二區則是兩國爭奇鬥艷的日英庭園及音樂花園區，在其中則安置了面積近 300 坪的「台灣喫茶店」，具備休憩與商業功能。最遠端的第三區則是遊樂區，包含了「日本不思議館」、「日本魔術館」、「自動車競走場」，以及「台灣土人村」、「愛奴村」、「愛爾蘭村」等人種展示區<sup>103</sup>，這場展覽再次凸顯日本和英國如何定義自己境內弱勢族群。此外，把人種展示劃分在遊樂區當中，是以娛樂為取向的設計，當然也包含了介紹珍奇的教育功能。對日本帝國來說，到英國參加博覽會是向歐美世界宣傳國勢的極佳機會，不過當時也出現了負面的聲音。有些日本人認為，會場中展示北海道愛奴

<sup>100</sup> 千カッフ美恵子，〈「人類館」事件とアイヌ民族〉（「人類館」事件與愛奴民族），收入大阪人權博物館編集《博覽會——文明化から植民地化へ》（博覽會——從文明化到殖民地化），大阪：大阪人權博物館，2000 年，頁 62。

<sup>101</sup> 松永真純，〈「人類館」事件と拓殖博覽會〉，（「人類館」事件與拓殖博覽會），收入大阪人權博物館編集，《博覽會——文明化から植民地化へ》，大阪：大阪人權博物館，2000 年，頁 66。

<sup>102</sup> 關於日本的愛奴人（愛奴語：Ainu，アイヌ）是居住在庫頁島和北海道的原住民。在愛奴語中，「Ainu」是「人」的意思。歷史上，愛奴人曾經在日本本州的北部、俄羅斯的庫頁島、千島群島、以及勘察加半島居住過。1868 年，江戶幕府的末代將軍德川慶喜把國家大政奉還給明治天皇，日本歷史上的明治時期正式展開。1869 年，在沒有任何協商的情況下，愛奴人所居住的「蝦夷」被正式納入日本的行政範圍內，同時也被改名為「北海道」。翌年，現代的戶口登記制度在北海道正式實行，所有的愛奴人從那時候起在行政上都成了日本人。在這之後，日本政府不但沒收愛奴人的土地，同時還將這些土地撥給新遷入的日本移民，以便鼓勵這些新移民對北海道的開拓工作。明治時期的日本政府，對愛奴人進行種種的同化，愛奴民族長期以來的生活習慣都受到官方的禁止，成為日本人眼中的「舊土人」，被迫強行接受「日本人」的生活習慣。1899 年（明治 32），日本政府制定「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表面上雖然是為了救濟愛奴人和傳授農業知識，但是在將他們定義為「舊土人」的同時，卻也造成了對愛奴人的制度化歧視，刻意將他們與「日本人」做區別。根據北海道政府在 1984 年進行的調查顯示，當時在北海道有 24,381 個愛奴人。不過，由於一般日本人對原住民族群帶有歧視以及污名化現象，很多愛奴人會傾向隱藏他們自己的族群性，或者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族源。戰後，愛奴人歷經了激烈的族群運動。2008 年 6 月 6 日，日本國會議員一致通過法案，正式將愛奴人定位為日本原住民，並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提高其社會地位。

<sup>103</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185。

與台灣原住民，只會使英國人以為，日本人的文化層次和生活狀態如同這些未開人種的等級<sup>104</sup>。在不瞭解東方的情況下，白種人所看到的東方人種都很類似，也會造成刻板的東方印象，這應該是部份日本人所疑慮之處。

日本人所謂的未開人種，具備何種原始風貌？姑且不論原住民的文化與生活狀態在博覽會中被如何呈現，展示活生生的「原始人」，就是一個最單純的賣點。看看中村古峽如何描述提波·沙豆蓋：

沙豆蓋的耳朵掛著直徑八公分左右的大耳飾。讓他暫時摘下取在手中觀看，恰好如鬪球盤的白球般圓形的木片中央，以貝殼刻入莫名其妙的圖案。將耳飾取出時，他耳朵怪怪的皺起很難看。可是他伸舌尖把耳飾周圍舔過，再度把它嵌回原來的的位置，結果耳朵突然膨脹鬆弛地下垂，正好像繪畫中所畫的大黑神般的有福相。支那人總稱他們這個蕃族為「大耳國之人」也是有道理的。(頁 219)

以長耳或長頸為美的象徵，在一些國家的少數族群都有出現，透過對局部身體的逐漸延展，來達到「非常體」的美感效果。這種塑身的結果，其實和英國女人的纖細束腰是類似作法。不過他們自我的審美標準，卻不相容於文明世界。反觀近代西方女性對於身體曲線過度追求，視蒼白、削瘦為時髦的女性美。二十世紀女性對於「瘦」的病態崇拜，關乎現代身體的文明美學，也成為西方世界的審美態度。長耳族或長頸族也是把身體當作可以雕塑的一部分，但是卻被當成珍奇的事物來看待。原因在於他們所追求的身體美有別於西方的主流價值，是一種自外於文明世界的美感經驗。提波·沙豆蓋的大耳被特別形容，是野性的迷思，也是原始的隱喻。

換一個角度來看，在提波·沙豆蓋的視線下，他所描繪的日英博覽會，也充分呈現了世界真奇妙的風情。平時生活在山地原野的人，突然越洋渡海到遙遠的英國，現代都會的聲光魅影，可能強烈刺激他敏感的各種感官。從他形容的驚奇事物，可以感受到巨大的文化衝擊，其中更多是來自現代文明的震撼。「文明」與「未開」的迎面對峙，凸顯情節的戲劇性，更展現了雙重的異國情調；一方面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的原始風情，另一方面則透過博覽會的寰宇搜奇，並穿插英國都會的摩登生活。這種書寫策略，是一種雙贏的局面。從未開社會一躍而到現代帝國，再回到原始部落，其中的轉折為故事帶來高潮，也強烈映襯了兩個世界的文明落差。

原住民在台灣漢人社會中是少數弱勢族群，相關題材卻極為日治時期日籍

<sup>104</sup> 同上註，頁 174。

作家所青睞。旅行是一種跨文化想像，中村古峽僅有的兩篇台灣書寫，幾乎都以原住民為主調，表徵了「異國情調」的濃淡決定作品內涵。日本歷來接受漢文化影響極廣且深，如果要以「異國情調」作為文脈的主要旋律，台灣的漢人文化比原住民文化是遜色許多。〈來自蕃地〉雖是一篇小說，但是從內容題材來分析，不脫作者的親身經歷，而這位提波·沙豆蓋，也應該確有其人。從〈到鵝鑾鼻〉到〈來自蕃地〉，可以看出作品發展的脈絡有連續性，在這兩篇作品中反覆提及牡丹社事件，中村古峽以冒險的心情前來「蕃地」，顯然受到該事件的巨大魅惑。不論在〈到鵝鑾鼻〉或〈來自蕃地〉，提波·沙豆蓋也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位人物，因為他的跨國移動，傳達了「文明」與「未開」的對置與對峙。

除了提波·沙豆蓋，主角在旅途中和不同部落的原住民邂逅，並且細膩描寫對他們的觀感，顯然以此作為「異國情調」的反覆旋律。縱使沿途都有日本巡查與本地導遊的照應，但是主角對當時的野性氛圍以及原住民的獐猛形象仍有強烈感受，小說中也常呈現他的心理描寫。〈來自蕃地〉的主角從鵝鑾鼻燈塔開始出發之際，在沿途不時陷入恐懼的心境，出現許多被害的妄想場景。以原住民想像為主軸的調子，次第揭開了中村古峽的台灣觀。例如在第三段「草埔後的一夜」，只敘說了一個小事件，是描寫主角因為飲用河川生水而引起腹瀉的經過；在夜半時分突然一陣腹痛，主角眼看隨行的警察因為晚酌而酣睡，為了不驚醒同伴，他只好自己摸索來到位於屋外的廁所。劇烈的腹痛造成不斷的腹瀉，主角一而再地往外跑。更令主角意料不到的是，他竟然找不到洗手的地方。草埔後社位於高地，地勢關係加上氣流影響，這裡整年都起風。舉目荒野，春寒陡峭，身在異鄉又有病痛，主角泛起欲哭無淚的無力感。雪上加霜的事情也發生了，他在如廁時彷彿聽到身後傳來聲響：

冷不防後方的茂林中，沙沙作響，不久就聽到二聲被柴刀或什麼東西砍下般的聲音。剎那間我的眼前浮起了昨夜和F警部一起抵達此處時，那等待警部回來並在門口一邊躬身、一邊叨絮控訴某事的三個蕃人的倔強身影。據警部說，他們因為築路的事情而和隔壁的蕃社之間發生糾葛，因此跑來控訴。或許是其中的一個生蕃——我的心臟感到胸口變成石頭般沉重。(頁 223)

無來由的顫慄，是一種心理投射，其實並非人為的聲響，而是主角過度的恐懼感。這一段落沒有所謂的結局，只有懸疑心情伴隨著倦極而眠的主角，以身體微恙的殘局迎接早晨的雞鳴。主角纖細敏感的官能想像，不是神經質作祟，而和日本人自牡丹社事件以來的「生蕃」印象有密切關聯。在國境之南的山野

叢林中，充滿了太多可以想像的事物。以文明人的詮釋角度，台灣的特徵可能會被窄化為「生蕃」出沒、「毒蛇」亂竄、「瘧疾」肆虐的野蠻世界。另一方面卻也可以轉化為浪漫的原始憧憬，是一片青青草香飄搖的原始樂土，可以助人擺脫文明社會的機械生活。殖民地在兩極化的隱喻中擺盪，遂也出現各種旁生枝節的細微書寫，卻大抵不脫這兩種最主要的徵象。

然而，只要還在「蕃地」之內，恐懼就無所遁形。第四段「可怕的一小時」，描寫主角從草埔後社出發，由於派出所的人力不足，因而警方幫他找來一位完全不懂日文的「蕃丁」做為苦力兼嚮導。在初次碰面時，主角對這位嚮導完全沒有好感，除了語言無法溝通之外，他還有一張陰鬱的臉，實在令人感到可怕。在展開旅程後，主角更是處於提心吊膽的狀態。原因在於，一般嚮導的工作通常是走在前方帶路，可是這個原住民始終跟在主角身後，並且保持三步左右的距離。兩人一路無言以對，主角卻不時可以聽見「蕃丁」拔刀砍除路旁樹枝的聲響。一前一後的登山步行，讓主角有被監視的危機感：

所謂「生蕃」這種人，聽說在與人會面時甚至會先盯著對方的頸部，然後判斷對方是易斬或難斬的脖子。而且也聽說在砍人時，一定會從後方突然襲擊。(頁 225)

被害的想像，再度佔據主角的思考。不過這個「蕃丁」似乎面惡心善，在途中還特地撿起主角被吹落在山崖邊的帽子，稍稍緩和主角對他的戒慎態度。再步行一段路程之後，不料竟被引入一戶「蕃舍」稍作停留。主角完全摸不著頭緒，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的嚮導和屋主交談，卻不知道談話內容。時間一分分的流逝，主角的內心又浮起莫名的恐懼，腦海泛生一有危險就隨時準備逃走的覺悟。他們在屋內停留了將近一個小時，在不安的等待中，主角隨意瀏覽了屋內的陳設。這個家屋顯然比一般的「蕃舍」更為寬敞，而且有許多裝置器物，看來屋主的來歷不小。在擺設的器物上，他看到許多裝飾性的圖案，其中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百步蛇的圖案。

排灣族的代表圖騰是百步蛇，百步蛇也是台灣五大毒蛇之一。對排灣族人而言，百步蛇是一種祖靈的象徵，他們認為自己是百步蛇的子民。而百步蛇也成為排灣族貴族的專屬紋飾，象徵鞏固貴族神聖的地位，同時具有強化階級社會結構的功能。因此，牠的圖紋大量出現在排灣族木石雕刻、日常用品及服飾上。在排灣族人眼中，百步蛇的性格很類似排灣族的頭目形象：獨立、安定、和平、彼此不會互相攻擊、不會主動攻擊別人但會反擊、不會到處遊走。<sup>105</sup>中村

<sup>105</sup> 潘立夫，《排灣文明初探》，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116。

古峽在旅行的當下，是否聽聞了有關排灣族與百步蛇之間的傳說？從他的文字當中無法得知。不過透過小說的文脈，可以發現他對排灣族的先決觀感，還是承繼自牡丹社事件的印象。至於百步蛇的地位，雖然是被排灣族人敬畏的對象，在〈來自蕃地〉主角眼中，卻總結了這兩者的負面印象；毒蛇的致命毒性和「蕃人」的野蠻本色。毫無疑問這也是他看到百步蛇圖騰後會湧起不快之感的原因。後來主角才知道，這位屋主是驅獵遊社（今位於屏東縣獅子鄉）的頭目，也是他的新嚮導。

故事最後一段「五、頭目家的寶物」，主角抵達了內文社（位於荊桐溪上游），這是進入「蕃地」的第三天。在當地警部的帶領下，他參觀了內文社的頭目家。在內文社的傳說，頭目的祖先是太陽之子，自古以來就擁有極大的勢力。但是當代的頭目似乎有些愚鈍，又每天沉湎於飲酒，因此失去了族人的尊敬。這位頭目的家中，似乎從先祖手中傳下不少寶物，在家屋內擺設許多雕刻品。不過引起主角興趣的，還是在頭目家外所看到的物品。從左手邊不遠的小林子進去約 60 公尺處，那裏有一顆枝葉繁茂的大榕樹，在樹蔭下出現了至今只能照片上看到的「生蕃的人頭架」，而且是兩個並列。近看之下，有點像是漢醫的藥櫃。一個是「生蕃」同志的人頭架，陳列了五十個左右的人頭。另一個則是「土人」的人頭架，大概放有五十多個吧。舉目所見的幾十顆人頭，呈現出形狀各異的骨骼架構。主角一邊凝視著架上的人頭，一邊思索他們在被砍下的那一瞬間，持刀砍頭的「蕃人」是以多急切的心情來完成這件事？隨著主角的想像，小說也漸入尾聲。

小說結束之際，寫到主角回東京不及半年的時候，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看到台灣原住民因為繳械事件而引起暴動的消息，內容指出恆春地方的數個「蕃社」突然企圖謀反叛亂，局勢日益不穩。原住民先後襲擊了該地區的幾個派出所，把數名警官和家人殺害，並且破壞當地的電線與電線桿。這一起暴動的參與者，是主角大部分都曾經參觀過的部落。而且殉職的人員名單中，也有招待過主角的警官。在一邊密切注意這些新聞的同時，主角不僅回想起那些部落頭目們猙獰的面孔，也擔心著殖民地友人的安危：

儘管如此，I 君到底怎樣呢？不知 F 警官能平安逃走嗎？那個肩膀健壯的驅獵遊蕃社頭目的面影又從我眼前浮現。——我有很長時間一直注視這個新聞，想著這些處於危險境地、日日忠實執行其勤務而值得尊敬的同胞的命運。（完）

中村古峽的殖民地之旅，得力於警察甚多，對官方必定心懷感激，也初識

許多警界同胞，這亦是他看到新聞後憂心忡忡的原因。當時日本內地人士來台，只要能夠透過關係尋求協助，在旅遊嚮導方面多半依賴各地官廳的巡查。但是以台灣人立場而言，警察形象是不可親近。殖民地政府的統治策略，即是運用嚴密的警察體系來監控島民生活與思想。因此警察是最基礎也是最嚴密的監控機制。有了警察，人們就生活在一個模糊的監督世界裡了。這種督察方式在理想上力求把握社會機體的最基本粒子、最短暫的現象<sup>106</sup>。警查的監控方式，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無法遁形。縱使人民表現出對警察的服從，其實是恐懼心態多於守法觀念。為了有效管理殖民地的人民，並且協助警察行使威權，更多嚴厲的法律與規範也應運而生。日治時期警察的職權掌管範圍相當廣大，幾乎細密包含人民生活層面的全部。不僅是治安刑事上的維持，還有戶口調查、「理蕃」政策、保甲制度、衛生行政，甚至原住民的教育事業都受到警察的監控。但是從中村古峽的立場出發，「蕃地」發生暴動，至使「這些處於危險境地、日日忠實執行其勤務而值得尊敬的同胞的命運」令人堪憂。

誠然，中村古峽的〈來自蕃地〉留下許多疑點，全文的架構也稍嫌鬆散。河原功指出，在中村古峽的〈來自蕃地〉中，並沒有說明「繳械事件」和原住民造反之間的問題。對原住民而言，槍械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當以狩獵為中心的生活體系被崩解時，他們的強烈不滿，只能試圖以徒勞的抵抗暴動形式來表現，而這是作者沒有表示理解的。從全體的文章脈絡而言，中村古峽的想法認為原住民只是偽裝順從而已，終究是一群不開化的愚眾。從哀悼犧牲的警官們做為作品結尾來說，中村古峽的視點，徹底是以支配者內地人的目光來看原住民。但是，沒有理由只責備中村古峽一個人，因為日本人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就是這種程度，而且新聞報導也對台灣原住民很冷漠。1930年代以降的作品以同樣的視點來捕捉台灣原住民形象的作品也不少。<sup>107</sup>河原功的觀察頗為準確地說明了日本人的原住民觀，也指出大眾媒體的偏頗態度。現代人的生活，幾乎透過新聞媒體來吸收新知、評析時事。新聞界採集和發佈信息有其新聞自由可言，但言論背後的權力運作往往無法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角的被害妄想，在小說結尾終於透過「蕃人」對警方的暴動行為而惡夢成真。〈來自蕃地〉的內涵，確實做到《中央公論》製作「世界大觀號」的宗旨：「是和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帝國以及以日本的新領土為背景而發揮異國情調最具珍奇趣味的創作」<sup>108</sup>。為了凸顯異國情調，中村古峽擷取了旅行記憶中最珍奇的

<sup>106</sup> 米歇爾·傅科(Michel Foucault)著，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1992年，頁212。

<sup>107</sup> 河原功，〈日本人の見た台湾原住民——中村古峽と佐藤春夫〉（日本人所見的台灣原住民——中村古峽與佐藤春夫），收入山口守編，《講座 台湾文学》，東京：国書刊行会，2003年，頁68。

<sup>108</sup> 「中央公論臨時增刊 世界大觀號」目錄，《中央公論》，1916年（大正5）7月15日。

片段，強調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張力。不論是被送往英國展示的原住民，或是沿途遭遇的「蕃人」，都不斷涉及我他區分與文明界線的設定。對台灣原住民來說，奴役的歷史始於喪失自己的區域給外統治者，他們被迫縮小自己的活動範疇，還有生活方式和經濟手段。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原始族群成為被想像的對象，他們被界定為低等文化的他者，面對文明只有瞠目結舌的模樣。觀看位置與他者之間的關係，說明了中村古峽在台灣紀行與小說中所再現的真實經驗，已非「真實」的景物，而是作者心境的投射，也是記憶篩選下的文學產物。

#### 四、結語

中村古峽畢生著作相當豐富，但多屬於心理學研究範疇。他年輕時代曾經對文學抱持熱情，也發表一些文學創作。由於 1913 年來台旅行的契機，促使他完成了兩部台灣相關作品〈到鵝鑾鼻〉與〈來自蕃地〉。這兩篇作品在他一生的創作總數來說，雖然只佔了極少的份量，但是就文學質感來說，或者是台灣文學領域的研究而言，都有重新挖掘的價值。雖然是短暫的殖民地旅行經驗，不過令中村古峽驚艷之處，儼然不在少數。筆者以為，中村古峽台灣相關作品的文學性，絲毫不遜色於 1920 年代的佐藤春夫。因為島田謹二的文學評論，使後人只注意到佐藤春夫，但是在 1910 年代前後，中村古峽已經親自跋涉到台灣南部「蕃地」，近距離觀察台灣原住民，並完成具有相當水準的殖民地旅行書寫。在探討台灣的南方書寫系譜之上，中村古峽是一個尚未被深掘的作家。本節的提出，適足以讓他逐漸現身，並藉此增補佐藤春夫之前的台灣書寫領域。

中村古峽的台灣書寫是異國記憶的一部分斷面，也投射了微觀的旅者視線。他的台灣「蕃地」書寫展現了盎然野趣與南國風情，對日本讀者應該有其美學渲染的效果，也有迷人的異國情調。異國情調是不同於本國文化或風土人情的特殊外國情趣，是跨境旅行書寫很常見的徵象。不過他在強調台灣原住民「未開」（savageness）的描寫部分，有可能深化日本人對台灣的刻板印象。將〈到鵝鑾鼻〉與〈來自蕃地〉並置比對，兩部作品相隔三年問世，文中所再現的台灣原住民形象已出現差異。〈到鵝鑾鼻〉所出現的原住民，不論是兒童或是成人，都傾向於強調其純真無垢的天性。縱使曾經參與牡丹社事件的「蕃人」後代，也能透過殖民者的啟蒙教化以學習文明的禮儀。不過這並非同理心的表現，而是以先進者立場的思維為出發點。〈來蕃番地〉的原住民書寫，則著重在兇悍陰鬱的想像，主角隨時處在一種被害妄想的氛圍。原住民的獵頭習俗確實存在，作者的恐懼心理不是一種誤解。但是當他決心要深入東部排灣族部落，他顯然有所期待，卻無

法有恃無恐。這種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反覆心理，足以洩露他對原住民認識的侷限。以作品的完成度來看，〈到鵝鑾鼻〉顯然比〈來自蕃地〉高出許多，也較為誠懇地呈現出 1910 年代的台灣圖像。

翻開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侵略史，可以重新詮釋文明的定義。文明已經不是野蠻的相反詞；帝國挾文明之名，對殖民地的佔領行為更是另一種形式的野蠻。藉由一位民間知識分子的觀點去側面理解大正時期日本人的台灣印象，尤其是透過旅行者的有限視野，這個欲求可能會出現狹隘的答案。誠然，說故事的人儘管誠心要再現「真實」，卻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真實的旅行故事已經成為記憶。這些記憶經過重新整理選擇之後，轉換成為文字呈現在讀者面前，而過程有可能是在作者無意識的狀態下進行，把真實的經驗用現成的套語、既有成見加以取代<sup>109</sup>。李維·史特勞斯曾經述說了旅行書寫的侷限，但是他在《憂鬱的熱帶》也出現這種疑慮。包括回憶錄、紀行、口述歷史等文字，甚至是照片的寫真特徵，其實都指涉了述說者的意識形態。這些文化論述，是否能夠成為殖民知識的重要詮釋？這個問題的提出，也可以用來對比中村古峽的民間立場和官方觀點的台灣認識之間的差異性。

透過第一節和第二節的討論，不難發現竹越與三郎的南方書寫，展現帝國雄偉的視野，他在《台灣統治志》，以科學理性的方式呈現日本殖民統治的績效。在 1910 年的《南國記》，則放眼東南亞區域，不僅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文化、政情有敏銳觀察，也是一部生動的南方遊記。而中村古峽的台灣書寫，則是以近距離的素描，細部呈現灣南部的風景。如果說竹越與三郎的文字，是一種宏觀的書寫姿態，中村古峽的台灣書寫，則是微觀的旅行者紀錄。官方與民間，宏觀與微觀，它們之間或許各有風情，卻也可以找到共同之處。竹越與三郎透過台灣總督府的協助，獲取許多殖民知識。中村古峽則是以徒步紀行的方式，來紀錄台灣社會的後山世界。他們選擇的詮釋方式，不論是用理性數據或是感性思維，都無法概括台灣的全部，而是不同角度的殖民地片斷。

薩依德《東方主義》透過西方文學作品來分析殖民者所建構的殖民知識，姚人多指出這是對殖民權力本質的誤判，他認為日本的殖民治理性是強調科學理性，殖民知識除了民族神話與文化論述之外，還有一系列科學調查的結果。這種調查結果而來的知識不是一個有系統的、扭曲的文化論述，而是千真萬確、嚴謹認真的明察暗訪。這種知識是一種關於被殖民者的科學，它是由數字、圖表、曲線圖、地圖、趨勢圖所構成。換句話說，最能展現這些殖民知識的應該是這種技術：國家生產的數字（state-generated number）。這種知識是由科學的方法取得，也被用在科學的用途，如何有效管理被殖民者。因此，像薩依德在《東方主義》

<sup>109</sup> 李維·史特勞斯著，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台北：聯經，1989年，頁33。

把整個殖民知識視為高度精緻的文化產品，在他的理論中，彷彿整個殖民主義只是一個再現的問題，殖民論述只與小說、戲劇、詩集、旅行遊記、繪畫、電影等所謂藝術文化作品有關，那就嚴重誤解了殖民論述的內容。殖民知識應該是所有知識形式中最實用的、最具體的典型<sup>110</sup>。

數字、圖表所呈現的科學理性，誠如姚人多所說：「這些數字及資訊以一種最直接的方式進入整個殖民地的治理經營之中，它把不確定性及錯覺驅散，剩下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毫無秘密可言的透明空間。」（頁 150）這個論點可以在竹越與三郎的《台灣統治志》得到最佳印證。不過，就某種相當基本的態度而言，帝國主義意指去思想、佔領並控制不屬於你所有的、偏遠的，並由別人居住和擁有的土地，這也顯示了文學、文化與擴張的帝國有所牽連<sup>111</sup>。薩依德的觀察，對有被殖民經驗的國家帶來諸多啟示。姚人多試圖以日本的台灣殖民經驗去解構《東方主義》的迷思，然而薩依德所處理的問題本非台灣。調查所呈現「現實」的知識類型，也不必然和殖民者文學作品的殖民地「再現」出現矛盾。

在中村古峽的文字中，文學展現的殖民知識是作者潛意識的產物。它雖然重構作者的親身經歷，也滲入了民間日本人的台灣認識。數字會說話，它的真實性有多真實？文學可以想像，它的虛構性有多虛構？這些問題，我不認為有標準答案。數字背後所運作的殖民治理性，包含了殖民者的權力運作。而日本民間的台灣認識，有一定程度是來自官方意識形態與大眾媒體的介紹，它們具有共生的關係。理性的數字與感性的文學，都可以成為殖民地的光與影，為它帶來繁複的想像空間。誠如下一章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就以旅行者的文化視野為日人開啟一扇想像的窗口。1920 年代的殖民地，已逐漸揭開南方蠻荒的野性面貌，而朝向現代化的風景建構，同時也提供旅行者更舒適的觀光環境。佐藤春夫旅台的心情，已迥異於竹越與三郎或中村古峽的探險心態，而展現旅行者浪漫的抒情風格。殖民地因為這些作家的凝視，有了更為豐富的文化表情。

<sup>110</sup> 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2 期，2001 年 6 月，頁 119-182。

<sup>111</sup>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2001 年，頁 38。

附錄一

竹越與三郎 (Takekoshi Yosaburo) 年譜

1865 年 10 月 4 日-1950 年 1 月 12 日

1865 年 (慶應 1)

10 月 4 日，出生於埼玉縣，為清野仙三郎的次子。別號三叉、鬼古先生、夢履等。

1870 年 (明治 3)

舉家從寄居地埼玉縣回到父親的故鄉新瀉縣。

1880 年 (明治 13)

前往東京，在儒學者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學習。

1881 年 (明治 14)

9 月，轉學至慶應義塾。

1883 年 (明治 16)

9 月，為了避免被徵兵，入繼伯父竹越藤平家成為養子。在福澤諭吉的斡旋下，在學期間即進入時事新報社工作。後來從慶應義塾中退。

1884 年 (明治 17)

因為反對福澤諭吉的「官民調和論」，退出時事新報社。

1885 年 (明治 18)

前往前橋 (群馬縣)，盡力於創設前橋英語學校。翌年開校後，成為該校教師。

1887 年 (明治 20)

成為《國民之友》的特別寄稿者。離開前橋轉往高崎，在猶興學館擔任教職，並盡力於創設高崎英語學校。11 月，回到東京，在《六合雜誌》、《基督教新聞》等刊物執筆。

1889 年 (明治 22)

1 月，進入《大阪公論》雜誌擔任社論者。11 月，進入民友社。該年和中村竹代結婚。

**1890 年（明治 23）**

擔任《國民新聞》社論撰寫者。春，在鹿鳴館和陸奧宗光相會，以後得到他的知遇。11 月，出版《格郎究》。

**1891 年（明治 24）**

7 月，出版《新日本史》（上卷），中卷於翌年 8 月刊行。

**1893 年（明治 26）**

3 月，執筆《國民新聞》社論，就一篇文章〈最近十五年間的思想變遷〉和德富蘇峰對立。

**1894 年（明治 27）**

8 月，刊行《支那論》。

**1895 年（明治 28）**

夏天，經由陸奧宗光的介紹，得到伊藤博文的知遇。12 月，和反伊藤派的德富蘇峰分道揚鑣，辭去民友社的工作。

**1898 年（明治 31）**

1 月在伊藤內閣的西園寺文相之下擔任文部省勅任參事官（到 4 月為止）。10 月，入憲政黨。

**1900 年（明治 33）**

8 月，渡歐視察英法等國的議會政治實情，翌年 3 月歸國。這一年，參與政友會的組成。

**1902 年（明治 35）**

8 月，當選眾議院議員，隸屬於憲政黨。

**1905 年（明治 38）**

9 月，出版《台灣統治志》，該書為去年至台灣視察之後的成果。

**1906 年（明治 39）**

2 月，出版《比較殖民制度》。5 月，到歐洲出席各國議院會議，盡力於日法協會的設立。11 月，成為《讀賣新聞》的主筆。

**1907 年（明治 40）**

7月，出發至中國旅行（歷時三個月）。12月，出版《三叉文集》。

**1909年（明治42）**

7月，展開南方視察旅行。

**1910年（明治43）**

4月，出版《南國記》，提倡南進論。

**1912年（明治45、大正元）**

8月，為了日本移民的實情視察赴美。12月，領導憲政擁護運動。

**1915年（大正4）**

和本野一郎、池田成彬等人發起「日本經濟史編纂會」。12月，《日本經濟史》第一卷刊行。

**1919年（大正8）**

刊行了《日本經濟史》八卷，成為確立日本經濟史學的礎石。

**1920年（大正9）**

1月，進入臨時皇家編修局，翌年1月開始至1926年5月為止，被任命為編修官長。

**1926年（大正15、昭和元）**

6月，擔任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的客座撰稿員。8月，赴滿州視察。

**1938年（昭和13）**

4月，出版《倭寇記》。10月，出版《日本的自畫像》。

**1940年（昭和15）**

透過西園寺公望的推舉，被任命為樞密顧問官

**1944年（昭和19）**

7月，在《朝日新聞》上發表對於東條內閣崩壞的歡迎談話。12月，妻竹越竹代去世。

**1947年（昭和22）**

9月，遭受公職革職處分。

1950 年（昭和 25）

1 月 12 日，過世於東京自宅。

**註：本年譜係參考下列書目製成**

佐藤能九、阿部恆久編，〈年譜〉（本年譜共收有 26 人，竹越與三郎列在第一位），收入松島榮一編，《明治史論集（二）》／「明治文學全集 78」，東京都：筑摩書房，1984 年 2 月初版第三刷，頁 425-426。



## 附錄二

## 中村古峽 (Nakamura kokyū) 年譜

1881 年 2 月 20 日-1952 年 9 月 14 日

## 1881 年 (明治 14)

2 月 20 日出生於奈良縣，本名蒨。父親中村源三，母親シウ，為家中長男，上有兩個姊姊，下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中村家在當時是村裡的富農，源三曾經擔任過第七代生駒神社神官、大阪府府會議員、奈良縣憲會議員、南生駒村第一任村長。

## 1896 年 (明治 29)

父親源三辭掉南生駒村村長，舉家遷往京都。認識杉村廣太郎 (筆名杉村楚人冠，新聞記者、隨筆家、俳句詩人)，得到他的知遇。郡山中學二年級中途退學，以進入醫學校就讀為目標，上補習學校準備考試。

## 1897 年 (明治 30)

4 月，虛報年齡為 18 歲，參加京都府立醫學校入學試驗，後考上入學。12 月，加入醫學校的佛教青年會。

## 1898 年 (明治 31)

身體狀況不佳，得到腳氣、肋膜炎、神經衰弱等病。父親、母親與姊姊也均臥病。5 月 19 日，父親因傷寒引發的肺炎而過世，享年 46 歲。生前留下債務。7 月，繼承家產成為戶長。學習英語、德語之餘，也寫小說投稿到新聞雜誌。10 月，自京都府立醫學校本科 (二年級) 退學，到六条醫院擔任藥局生。

## 1899 年 (明治 32)

2 月，前往東京。4 月，寄居杉村楚人冠家中。杉村楚人冠和友人成立「佛教清徒同志會」 (後來的新佛教徒同志會)。受杉村的門生影響，立志考取大學。9 月，進入京華中學校就讀五年級。身體狀況不好，心理深陷疾病恐懼。因為身為長男，往後十年之間，縱使為疾病與貧困而苦惱，也持續匯寄生活費給家中的母親與弟妹。

## 1900 年 (明治 33)

7 月，「佛教清徒同志會」創刊機關誌《新佛教》，參加該同志會的集會、國語講習會，後來有許多文學創作在此刊物發表。9 月，進入第一高等學校文科就讀。10 月，和友人創刊巡迴雜誌

《新眼》，以胆山的筆名發表散文、小說。《新眼》到 1911 年 12 月為止，共發行 11 期。這段期間也同樣受到腳氣、神經症等病困擾。因為對於自己身體的自卑感，高中三年的宿舍生活中，一次也沒有和室友同浴過。

### 1902 年（明治 35）

次弟義信來東京。從該年起大約四年的期間，一邊從事《新佛教》編輯雜務，同時也以好幾個筆名在該雜誌上發表詩歌、小說、隨筆、評論、雜論。也透過杉村楚人冠的斡旋，擔任《中央公論》海外思潮欄的翻譯，也從事其他兼職工作。

### 1903 年（明治 36）

7 月，一高文科畢業。9 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科（英國文學專修）就讀。接受夏目漱石、上田敏、大塚英治、芳賀矢一等老師的講義課程。對文學熱情高漲，立志成為作家。

### 1904 年（明治 37）

經由杉村楚人冠的介紹，擔任東京朝日新聞社國外報導部的翻譯，也從事其他兼職工作。

### 1906 年（明治 39）

7 月到 9 月，擔任《新佛教》臨時編輯長。這一年，次弟義信的言行舉止開始出現異常，歸鄉入院。和森田草平一同去巢鴨醫院吳秀三博士的精神病學教室上課。在大學也接受福來友吉的催眠心理學聽講。

### 1907 年（明治 40）

2 月，經由杉村楚人冠的介紹，已內定將就職於東京朝日新聞社。5 月，家庭的貧況被夏目漱石所知，接到夏目漱石的信，告知如有任何困難樂意相助。7 月，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科畢業。8 月，東京朝日新聞社入社，先後在國外報導部、社會部工作。接受夏目漱石的金錢援助。

### 1908 年（明治 41）

中村古胆（筆名）編《日常生活行為的基準》，內外出版協會刊行。取得文部省頒發之中等英語科教員執照。7 月 16 日，次弟義信在京都的船岡精神醫院逝世，享年 23 歲。12 月，以一年志願兵身分進入橫須賀重砲兵第一聯隊第一中隊，因為生病所以除役。

### 1909 年（明治 42）

5 月到 6 月期間，到「滿韓」旅行，也到哈爾濱。

### 1910年（明治43）

4月，東京朝日新聞社退職。成為高輪高中教師，主要教授英語。時常拜訪夏目漱石。這一年，到王子醫院訪問門脇真枝，受教於精神醫學關係的教導。專心執筆自傳長篇〈犧牲〉（後改名為〈殼〉）。

### 1912年（明治45・大正元）

3月，在東京市外品川御殿山置屋。不久即把母親從故鄉接來東京，和小弟一義們共同生活。夏目漱石的斡旋，在《東京朝日新聞》連載自傳小說〈殼〉（筆名中村古峽，7月26日至12月5日，共113回）。

### 1913年（大正2）

1月，前往台灣旅行，在台灣結識小畑照世。4月，《殼》出版單行本，春陽堂刊行。4月，和小畑照世結婚入籍。6月，台南紀行〈到鵝鑾鼻〉在《東京朝日新聞》連載（筆名古峽生，6月19日至7月5日，共16回）。7月，請夏目漱石替小說《殼》寫推薦文遭拒。

### 1914年（大正3）

4月，和友人創刊《反響》雜誌。出版譯著《即興詩人》、《天才與狂氣》、《英雄崇拜論》等。

### 1915年（大正4）

10月，向村上辰五郎學習催眠術，學成後頻繁為人施術。

### 1916年（大正5）

7月，自高輪中學退職。8月，小說〈來自蕃地〉發表於《中央公論》。收到夏目漱石來信，對其小說嚴厲批評。12月9日，夏目漱石逝世。

### 1917年（大正6）

5月，在品川區御殿山（自宅）設立日本精神醫學會，並設置診療所，開始治療神經性疾病患者。10月，日本精神醫學會機關誌《變態心理》創刊，至1926年10月為止共出刊103期。

### 1919年（大正8）

出版《變態心理的研究》（大同館書店）。

### 1920年（大正9）

5月，妻子照世的父親在台過世，為此來台灣大約兩個月。

**1923 年（大正 12）**

1 月，第四個兒子周死去，兩歲。3 月，最小的弟弟一義死去。9 月 1 日，發生關東大地震。由於兒子與弟弟的死亡，以及大地震的體驗，重新燃起文學創作的慾望。

**1926 年（大正 15、昭和元）**

6 月出版小說集《變態心理的人們》（大阪屋号書店）。和妻子照世協議離婚。為了設置醫院而向杉村楚人冠、佐藤春夫、森田草平、生田長江等友人借款。

**1928 年（昭和 3）**

3 月，東京醫專畢業。4 月，取得醫師執照。

**1929 年（昭和 4）**

1 月，和杉山琴登記結婚。

**1933 年（昭和 8）**

11 月，著手在千葉市內建立中村古峽療養所。

**1934 年（昭和 9）**

12 月，中村古峽診療所完成，開所。御殿山的診療所也一周問診兩次。

**1938 年（昭和 13）**

2 月，母親シウ逝世，享年 82 歲。

**1941 年（昭和 16）**

1 月，在杉山田直樹的推薦下進入名古屋醫大攻讀博士學位。10 月，學位論文完成。

**1942 年（昭和 17）**

7 月，獲得名古屋帝國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

**1945 年（昭和 20）**

4 月，三男寬在南太平洋出征病死。5 月，因為空襲，御殿山的三棟建築燒毀。6 月，和妻子疏散到山梨縣。8 月 15 日，終戰。23 日，回到千葉。

**1949 年（昭和 24）**

9 月，被診斷出腦溢血。這一年，「中村古峽療養所」改名為「中村醫院」。

1951 年（昭和 26）

因為動脈硬化，辭去中村醫院院長一職。

1952 年（昭和 27）

6 月 10 日，妻琴死去，享年 67 歲。9 月 14 日，中村古峽逝世，享年 71 歲。

註：本年譜係參考下列書目製成

曾根博義編〈中村古峽年譜〉收入小田晋編《『変態心理』中村古峽——大正文化への新視角》，東京都：不二出版，2001 年 1 月第一刷，頁 192-205。

曾根博義編〈中村古峽著作年表〉收入小田晋編，《『変態心理』中村古峽——大正文化への新視角》，東京都：不二出版，2001 年 1 月第一刷，頁 205-219。

